



統計工作叢書(2)

# 馬克思列寧與統計

東北計劃委員會統計局譯印

一九五二年

統計工作叢書之二

# 馬克思列寧與統計

東北計劃委員會統計局編印

1951

統計工作叢書之二

## 馬克思列寧與統計

譯者 東北計劃委員會統計局  
出版者 東北計劃委員會統計局出版部  
印刷者 長春新報印刷廠第二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  
經售 全國各地新華・三聯書店  
1951年6月初版 定價人民幣3.80元

No. 1-10,000



## 統計工作叢書序言

自從東北人民政府決定加強統計工作，半年多來東北區各部門、各省市都建立和健全了統計機構，學習蘇聯社會主義統計工作經驗，製訂和審定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統一報告的統計表格，展開統計工作。但是在統計理論方面，過去我們對於馬列主義著作的統計部份翻譯介紹的却很少。我們知道統計理論是指導統計工作，對做好統計工作是有決定意義的。因此我們決定選擇蘇聯有關統計的文章翻譯介紹出來，編輯成『統計工作叢書』出版，藉以幫助各地學習提高統計業務。

社會主義的統計學，是與舊的資本主義統計學有着本質上的區別。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它是被統治階級所掌握，用來掩飾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以及反對勞動人民進行革命鬥爭的一種工具，所以他們抽象地廢弄許多複雜的數學原理和公式，用這種虛偽的科學企圖歪曲事物的本質和其發展規律。而新的社會主義統計學，則是以馬列主義的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為基礎的一種科學；在蘇聯三十多年社會主義建設中，它已發揮了計算與監督的作用，並且其本身亦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充實。現在，它成為有着嶄新內容的一門獨立的科學。

但是對我們來說，這種新的統計還都不大熟悉。在現階段的民主主義經濟建設中，我們需要努力學習這種新的科學。而過去學過舊統計學的人們，為了以新的科學批判和揚棄舊的知識，重新武裝自己，更有加強學習新統計學的必要。

本叢書中所收集的文章都是具有工作指導意義的，可以作為財經部門工作人員，和統計工作人員的業務學習讀物，亦可作為各專科學校的統計課程參考之用。

『統計工作』編委會

## 目 錄

馬克思、恩格斯與統計·····	1
列寧與統計·····	32
斯大林與統計·····	51
論統計分組法·····	66

# 馬克思、恩格斯與統計

卡 石 卡 列 夫

列寧在其紀念恩格斯的一篇文章裡，曾經這樣寫道：『可以用兩三句話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工人階級的功績表示出來，那就是：他們不但教導了工人階級自知和自覺，而且還把空想變成了科學』（『列寧全集』，第四版，第2卷，六頁）。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統計學，已經成了工人階級認識自己的工具之一和認識社會的有力武器。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經濟學和哲學方面所完成的變革，使統計學的本質和作用、內容和方法，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闡明了統計學的階級性，他們說統計學是一種黨性的科學。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佔領導地位，乃是與資產階級統計學根本不同的、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科學的新統計學的基礎。

作為一種獨立科學的統計學，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同成長起來的，是與政治經濟學緊密聯系中發展起來的。

馬克思在論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時候，揭露了它的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古典政治經濟學從配第開始，便是研究資產階級生產的內在依存關係的。

馬克思寫道：『配第覺着自己是個新科學的創始人，他說他的方法是「非凡的」。但他並不把那比較級和最高級的許多字句和理論上的根據結合在一起，而竟用那數量、重量和尺度來加以說明，專門利用那種來自感性經驗的根據，僅僅研究那些在性質上具有顯

然根據的原因。他勸別人要來研究爲各個人的智慧、見解、希望和熱情所左右的各種原因』（『馬恩全集』，一九三五年版，第ⅩⅠ卷，第三九頁）。

對於研究社會經濟的依存關係來說，學會用數量來說明經濟現象的本身以及它們中間的依存關係，是很重要的。

配第（馬克思稱他爲政治經濟學之父，而在某些方面則稱他爲統計學的發明者）研究了資產階級各種關係的內在依存關係，結果，使他建立了政治算術。

恩格斯對於配第用數量來說明經濟現象依存關係的這一創舉，非常重視。恩格斯批評杜林時，曾經這樣寫道：『這也是當然的事，因爲擺臭場面的學究似的庸夫，對於最天才的而且最特出的經濟研究家，只能表示自己怒氣沖沖的不滿，只能埋怨，爲什麼理論的閃光沒有高傲的、齊整地，作爲早已準備好了的「公理」表現出來，而只是靠着「粗雜」的實際材料的探究，例如租稅問題的探究，散亂地表現出來。

杜林先生對於配第的純粹經濟的著作採取這樣的態度，杜林先生對於配第是「政治算術」（通俗地說，就是統計）之創造者的這一事實，也採取同樣的態度。他對於配第所用方法的奇特，只是惡意地聳聳肩頭。……如果我們想到，現在的統計，還是如何遼遠地離開配第所提出的目的，那末，這一種在兩世紀後自以爲高明的驕傲，就只是表現出它自己的絲毫不能粉飾的愚蠢』（恩格斯著『反杜林論』，吳理屏譯本，三聯書店版，第二六八頁）。配第在研究統計資料的時候，廣泛利用了分組法、平均值和相對值。他藉助於這些方法去研究『粗雜的材料』。

配第著作中的統計學，是進步的，是唯物主義的，因爲它的目的在於用計量和比較的方法來研究客觀存在的經濟現象和其中間的關係。

配第的經濟研究和其他『政治算術』上的主要缺點，就是他對



待被研究的社會經濟現象和對待非歷史現象一樣，都抱有一種形而上學的觀點。『政治算術』並未看到：它們所研究的現象和依存關係，只是一定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所特有的。

馬克思教導我們說，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不但階級鬥爭愈趨尖銳和露骨，而且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甚而在局限的範圍內也不再是科學的東西了，它逐漸成了庸俗的和卑劣辯護性的東西了。『一八三〇年發生過一次經濟危機，它是比較具有決定性的。法國和英國的資產階級奪取了政權。從這時起，無論實際的階級鬥爭和理論上的階級鬥爭，其方式也就表現得愈益險惡了……。以後成為問題的，不是真理與非真理的問題，只是對資本有益或有害、便利或不便利、違背警章或不違警章的問題……。真正的科學考察沒有了，代替的東西，是辯護論者的歪曲的良心和邪惡的意圖』（馬克思著『資本論』，中文本，郭、王合譯三聯書店版，第一卷，七頁）。

除了辯護資本主義和衛護它的永存性而外，資產階級學者們的思想，便更加向着下面的方向走去，即通過各式各樣的捏造方法，為維持政治平衡和粉飾資本主義的真實情況而配製藥方。在這方面起着積極作用的，就是那種以庸俗政治經濟學、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為依靠的反動的資產階級統計學。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裡，資產階級統計學的最顯要的代表者，就是快特萊。快特萊認為他的任務就是要給政治科學和精神科學附加上一種以觀察和計算為基礎的方法。但是，身為形而上學的唯心論者的快特萊，並不去研究經濟現象及其發展規律，把它們當作一種歷史範疇來看，而竟集中力量去說明，社會現象和天體運行相同，都是受那種永恒法則的支配的。據快特萊的理解和發揮，他說統計學乃是社會物理學。至於社會物理學，據他說，『……應當研究那些鞏固人類和社會制度並使社會制度成為第二天體力學的存續法則，而社會制度的神秘基礎，則由宇宙創造者巧妙地安排妥了』（快特萊著『社會制度及支配社會制度的法則』）。



快特萊利用那正確到千分之一的大數法則定理，計算結婚、犯罪、自殺等等的趨勢，結果得出一種平均人的類型。快特萊會常加研究的平均值，便成了他說社會秩序穩固的一個證據。快特萊說道：『我在這裡所觀察的人，在社會中，猶如物體的重心一樣，他是一個平均數，各個社會成員都圍繞他搖擺不定……』（快特萊著『社會物理學』，一九一一年版，第一卷，第五四頁）。

據快特萊說，所有的人，無論具有或大或小的偏差（誤差），都是一種平均人的類型。他把這種類型叫做『我們種族的類型』。

這位唯心論者快特萊在研究上的出發點，就是他所創造的『平均人』這一概念，凡實際生存的人，都與它或多或少有『偏差』。

我們在快特萊的這種理論裡，即能看出那種完全徹底反動的、非科學的現代資產階級統計學的一切萌芽來。快特萊認為：統計學是萬能的科學，而其對象就是人類各種知識中具有變化性的各種現象。

認識那種『支配着社會現象』和超時間而存在着的法則的方法，在快特萊說來，就是機率論。於是，伯爾努伊和拉蒲拉斯的定理，便成為他證明所有社會生活方式的不變性和永久性的方法了。至於機率論，在他說來，也就是認識一切社會現象的方法；他說，離開機率論是不可能認識這些現象的。

在資產階級統計學家們的著作中常機械地、非科學地應用機率論去研究社會現象，關於這一點，拉法格（馬克思的學生和同時代人）曾如下寫道：

『快特萊和包阿森……是兩個數學家，他們以沒有十分把握的希望，企圖利用司法統計資料，最後給機率論方法的應用取得一種實際的結果……他們研究了犯罪和犯罪者的數字，但不注意產生它們的社會條件，他們把犯罪和犯罪者數看作是一種論理上的層層推斷，這正像等差級數和等比級數一樣，所謂靠自身的內在力量擴

展起來。他們復活了（當然是以極其緩和的形式）畢達格拉斯的學說，即把玄妙的屬性附加於數字之上的學說』（拉法格全集，第二卷，一九二八年俄文版，三四六頁）。

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出現以後，我們才有權利來談論真正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統計學的發生和發展，才有權利來談論它與資產階級的統計學、即以形而上學和唯心論為基礎的統計學進行的鬥爭。

馬克思主義統計學在其基礎上是完全否定資產階級統計學的基本原理的，同時又是完全否定藉以衛護這些原理的全部武器的。

但是，這並不是說資產階級統計學所建立的一切，都被馬克思和恩格斯拋棄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了由科學所達到的一切有價值的東西。

我們需要指出：在我們的刊物上和科學著作中，對於闡明統計科學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發展問題，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未予以足夠的注意。某些統計學教科書的著者們指出說：統計學是一種階級性的科學，但在教科書中敘述這門科學的歷史時却很少反映統計學的階級性。對於辯證唯物論和唯心論、形而上學在統計學中的鬥爭，闡明得還很不够。在某些著作中，著者們『客觀地』說明資產階級統計學家的著作內容時，他們並未指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對於新的馬列主義統計學的發生和發展所起的巨大的決定性作用，他們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對資產階級統計學展開的批評，緘默不談。

形式主義方向的統計學家們在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統計學時，只去摘取個別文句和定義。某些統計學教科書在頭幾頁裡就引證馬克思主義奠基者們關於經濟分析的作用、關於政治經濟學是統計學的基礎的語句，但其後在同一些教科書中敘述統計學史的時候，却把它看作是機率論的發展和應用的歷史而加以敘述，反而與統計學的理論基礎——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毫無聯系。這

種事實不是偶然的，這完全是由於站在錯誤的立場上去理解統計學的對象和方法而產生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與形而上學（它把現象的相對穩固性變成了絕對的穩固性）進行鬭爭時，也不得不去揭穿那些證明社會現象穩固性的統計方法，特別是揭穿那些對大數法則和平均值的形而上學的論述。

資產階級的學者們爲了從數字上證明資本主義世界的永存，於是對平均值和大數法則便賦予了特殊的意義。資產階級的統計學家們並不能認識現象的本質，而且在大多數情形下也不希望去認識現象的本質（註），他們認爲事件與平均值的偏差，是受大數法則支配的，他們把平均值看作是現象的永恒不變的類型。

馬克思在研究價值範疇、平均生產價格、平均利潤、平均社會必要勞動等等，以及當研究某些經濟現象的發展水平而利用平均值時，他指出了平均數在社會過程分析中所具有的認識作用的意義和界限。

馬克思指出過：把大數法則看成支配現象波動性的法則，是錯誤觀念。現在我們把馬克思的一段話引證在下而：

『各生產部門的商品皆依照價值售賣的假定，當然不過包含這樣的意思：即，這個價值成爲一個重心，商品的價格是在這個中心的周圍擺動，它不絕傾向於均衡化而上下漲落』（馬克思『資本論』，郭、王合譯本，三聯版，第三卷，一二六頁）。

我們從馬克思的學說中可以得出下列的結論來：並不是大數法則『支配』着圍繞平均值的波動性。在資本主義下價格與價值背離之相互抵銷，是在價值法則（它是資本主義經濟盲目過程的基

---

註：萊克西斯是以其企圖建立穩固論基礎而出名的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關於他，恩格斯曾經說過：『……他是一個名利主義者，因而他就裝作一個庸俗的經濟學家』（馬恩全集，一九三五年俄文版，第XIV卷，六〇三頁）。



礎)的作用下實現的。

在科學的分析中，有兩個研究階段。第一個階段：記敘和記錄現象，例如記錄市場上的商品價格。這種用『數量和尺度』進行的必要的現象記述，給進一步的研究創造了材料。但是這個分析階段還是不夠的。我們僅僅知道價格波動着和價格的波動範圍，還不夠；我們僅僅像快特萊一樣，只計算出這種波動是圍繞平均值而實現的，這還不夠；我們還需要確定出支配着這種波動的法則；還需要揭露出：為什麼價格發生波動，以及它圍繞着什麼東西而進行。快特萊和資產階級統計學家的代表者們，在利用大數法則時，無論怎樣擴大他們的觀察範圍，也是不可能回答這些問題的。

在我國出版的某些統計學教程中，引證了被著者曲解了的馬克思的個別語句，他們並且利用這些語句爲形而上學的原則建立基礎，如：大數法則是統計學的基礎，現象有特殊的統計規律。

例如，在中等專科學校用的統計學教程（著者葉若夫、卡岡斯基等人）中，引證了馬克思的下述文句：『市場價格一時比那起着節制作用的生產價格高，一時又比它低，可是這種偏差是互相抵銷的。如果我們從多少長一些的時期來看價格表，除掉因勞動生產率變動而使商品的實際價值發生變動以及因某些自然災害或社會災害而使生產過程遭到破壞的情形，那麼，給我們很深的印象的，首先是偏差的範圍相對的狹窄，其次是這種偏差很有規則地彼此平衡。我們在這兒遇着快特萊在社會現象方面曾指出過的那種起着節制作用的平均數的統治』（加着重點特別標出的地方在該教程中並未引用——卡註）（馬克思『資本論』，一九三八年俄文版，第Ⅲ卷，七五八頁）。

著者們從引證的文句中，得出了下面的結論：『馬克思着重指出說：這些波動的規律性就是快特萊所發現的那種規律性，即統計規律性』（葉若夫、卡岡斯基著『統計學教程』，一九四七年俄文版，二四〇頁）。著者們企圖利用馬克思的話去找出馬克思和唯心

論者快特萊在理解社會過程上的共同性，藉以奠定統計規律這一形而上學範疇的基礎。我們在前而已經說過，馬克思並未把價格波動藉以均衡化的規則解釋成『統計規律』（像該教程著者們隨着快特萊而說的那樣），而是解釋為現象自身的法則。馬克思的解釋和資產階級統計學家、特別是快特萊的說法之間的原則上的區別，也正是在這裡。關於快特萊，馬克思說過下面的話：『……他證明了：就是在社會生活的似乎是偶然性的中間，由於它們的週期復現性和週期平均數，它們是具有內在必然性的。但是它對這種必然性的解釋是完全失敗的』（馬恩全集，一九三五年俄文版，第X X V 卷，七頁）。如所週知，快特萊對於他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所觀察的數字（犯罪的百分比等）的反複性，是用神賦給人們的玄妙的嗜好來解釋的。

在該教程著者們所『減縮』的那段馬克思的文句中，包含着對數字週期復現性原因的實質解釋：只有在社會經濟條件（各該現象發生於其中的）不變或變化很小的情形下，數字的週期復現性才是可能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指出過：這種推定，雖在某些情形下是一種必要的科學抽象，但却是有條件的。恩格斯在談歷史事件的表面上的偶然性和作為這種事件的基礎的法則時，指出過：使社會歷史發展法則擺脫『……玄妙的形式並呈現出它的真面目和全體性』（馬恩全集，一九三一年俄文版，第X IV 卷，九頁），乃是他和馬克思所提出來的任務之一。

×

×

×

唯物論認為物質世界是第一性的東西，它是能被認識的。唯物論的這種基本原理也表現在對現實的研究方法上和表現在為此研究目的而利用統計上。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指出過：他的著作的最終目的，是揭露近代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的經濟法則。馬克思指出過：人類社會的解剖應該在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找，並且着重指

出：人——這首先就是社會性的存在。

關於政治經濟學和統計學在科學研究中的聯系和作用，馬克思曾在致恩格斯信中寫道：『關於地租學說……我要說明如下：

（一）我在理論上唯一要證明的事情，是絕對地租不破壞價值法則也是可能的……

（二）關於絕對地租是否存在的問題，在各國，好像都是一個要由統計解決的問題』（資本論，第三卷，三聯版，七七二頁）。

政治經濟學和統計學在經濟分析中是相互聯系和彼此補足的，並且政治經濟學是基礎，而統計研究應該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指出過這一點。例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研究利潤率下降傾向的問題時，寫道：『並且，又只有先瞭解利潤率所依以形成的各種關係，然後可以把統計應用在各時代各國家的工資率之現實的分析上』（資本論，第三卷，郭、王合譯本，一八〇頁）。馬克思和恩格斯與經濟問題研究中的單純的經驗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與那些以統計資料的整理來代替理論分析的情形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爲了確定統計學的對象、統計學與政治經濟學的聯系；爲了發展真正科學的統計研究方法；對於數量和質量的統一給以辯證的理解，是有極大意義的。

馬列主義的奠基者們，要求對現象作全面的分析。現象的相互依存關係的研究方法，質變（它是數量積累的結果）的研究方法，是馬列主義科學統計學中的基本的東西。道正和事件的機率研究方法相反（資產階級統計學的力量都用在機率研究方法的發展上了）。

×

。×

×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深刻研究統計資料，非常注意。例如馬克思爲了寫『資本論』中談工人立法的二十個頁文章，曾研究了英國工廠監督官的全部『藍皮書』叢書，並且對於能從這種統計中抽出



的一切最重要的東西，都作了詳盡的總括。馬克思一八六八年三月六日在致庫格曼的信中寫道：『當我不健康的時候……我不能夠寫，但是我却讀了大量的統計「資料」和其他「資料」』（馬恩全集，一九三六年俄文版，第ⅩⅩⅦ卷，五一六頁）。

恩格斯爲了說明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曾研究了大量統計資料，他還把這些資料用個人的觀察和個別的事實加以補充。

列寧和斯大林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是這樣做的。我們想一下下面的情形就足夠證明了：只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本著作中，列寧就利用了大約五百種統計資料彙集。

科學的統計學的奠基者們，在各種各樣的著作中，由『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資本論』開始，直到關於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歷史問題各方面的論戰文章，都引用了統計資料。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本身，首先就已證明了他們對於統計資料具有非凡的知識，證明了他們批判地估價和巧妙運用統計資料的情形。與馬克思同一時代的人們認爲：馬克思在統計知識方面是無比的。例如別茲利教授（他寫過關於共產國際史的論文）說過：『協會的成就應以馬克思博士的功勞最大，依我看來，他的歷史知識和對於歐洲一切國家中工業動態統計的知識是無比的。本文中包括着的資料，在很大程度上……我應歸功於他』（馬恩全集，一九三六年俄文版，第ⅩⅥ卷，第二部，二〇三頁）。

馬克思根本未作過統計資料的存摺。實際資料對他的用處，是爲了深刻的、更加大大前進的理論總括。馬克思的同時代的人們着重指出過：『……馬克思擁有極廣泛的學識，但他並未沉迷於他所累積的大量未加工的材料裡，而是主宰了這種材料……並且用天才的思想闡明了這些材料』（『莫斯科電訊』，一八八三年，三月七日至十九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爲自己的工作綿密地積累了統計資料，從這些資料裡給自己創造了基礎，這不僅是爲了當時他們所從事的研究，

而且還給未來的工作創造了資料。無數的統計數字摘抄，淵博的統計資料來源提要，都證明了這一點。

常常有許多人請求馬克思給他們介紹各種問題的資料來源。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他們認為最好的統計彙集。例如：一八五一年十月十六號馬克思給威捷邁爾寫道：『我向你介紹……馬克·蓋洛克的「商業辭典」，一八四五年出版……還有更新的書，如馬克·戈列高爾的書，他的統計手冊大概是全歐洲最好的。但這些書都很貴』（馬恩全集，一九三六年俄文版，第ⅩⅩⅤ卷，一一三頁），接着馬克思又指出了許多國家的統計資料。

馬克思和恩格斯爲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不得不利用資本主義的統計資料，但他們總是以批判的態度對待每一個數字。他們第一個着重指出了並揭露了資產階級統計的辯解性和捏造性。

恩格斯在研究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時（當時英國的統計被認為比歐洲其他國家都好些），寫道：『工廠主……甚而發表很詳細的表，以證明機器並不排擠成年男工。這些表一般都滲雜着歪曲了的數字，不可靠的數字……這些表並不談各種最重要的問題，它們只證明着作者（工廠主）的盲目利己主義，證明他們沒有良心』（馬恩全集，一九三〇年俄文版，第Ⅱ卷，四三一頁）。

關於農業的資料所受到的歪曲也不小於工業統計中的歪曲。馬克思在『歐洲的食糧缺乏』一文中指出：『關於法國的發狂一樣的關心，可根據其虛偽的收穫報告判斷出來』（馬恩全集，一九三三年俄文版，第Ⅸ卷，二〇六頁）。

比較不能對比的資料，乃是資本主義統計學喜歡運用的捏造手法之一。這種手法已被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一再揭露過了。馬克思指出過：如果不考慮每一個國家的特殊性，『如果不把這些國家裡存在着的各種關係加以必要的對比』（馬恩全集，一九三八年俄文版，第一卷，二六五頁），就不可以比較各種國家（如英國、法國、普魯士）的資料。

特別受到捏造的，是那些標誌工人階級狀況和勞動人民狀況的資料。捏造的程度隨着階級鬥爭的增長而增加起來；資產階級學者手中的統計學，更加成了資本家們爲保存現存制度而鬥爭的工具了。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章中，說到企業的分工時，加了這樣一個註釋：『……但國會的報告，却不但明白把技師機械師等等，並且把工廠監工、營業員、職員、外勤職員、貨棧員、包裝員等等包括在內——總之，除工廠主外，一切人都包括在工廠勞動者中了。這種混淆，是統計蓄意將其相蒙蔽的特徵』（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郭、王合譯本，三四〇頁）。故意歪曲了『工廠工人』的概念，於是就能够作出任意的、對資本家有利的工人生活水平等等的結論來。

馬克思指出過：『隨着資本的積累而階級鬥爭也跟着發展起來的時候……官方統計也就成了更加騙人的指標了……』（馬恩全集，一九三七年俄文版，第ⅩⅦ卷，七一八頁）。

這是馬克思大約在九十年前說過的話。從那時起，資本主義統計學的捏造資料的技巧日見改進一直成了非科學的、辯解性的東西。

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利用了那些往往對極重要問題並沒有回答的資本主義統計資料，他們還極力自己直接地獲得需要的資料。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在曼徹斯特生活和工作時，靠着訪問工人而獲得了某些數字資料。恩格斯爲了獲得關於德國無產階級的資料，曾製訂了一些詳密的問題提綱（各地應按這些問題提綱，填送一些報導、『記述和統計制記』，給恩格斯和蓋斯一八四五年在德國創辦的『社會之鏡』社會主義雜誌）。關於這個雜誌，恩格斯曾通知馬克思說，這個雜誌預定提供一些關於社會的貧困情形和資產階級制度的情形。恩格斯認爲這些報導的任務，在於幫助『……專以事實爲根據……正確闡明一切階級的社會關係……』（馬恩全集，一九三〇年俄文版，第Ⅲ卷，五九五頁）。

恩格斯叫人們特別注意記述勞動的性質，各種有害健康的勞動



的性質，特別注意童工勞動和女工勞動及其結果，特別注意女工、童工勞動排擠成年男工的情形。

恩格斯請求大家報導特別殘酷剝削工人的事實，隨便延長勞動日的事實，強制在休息時間擦機器的事實，以粗野的態度對待工人的事實，以商品支付工資的事實等等。

靠着雜誌的讀者和同人搜集來的資料，曾是應該提供關於德國工人階級狀況的材料。

恩格斯自己搜集了並從工廠監督官的報告中得到了關於英國工人的同類資料。這些資料在恩格斯的經典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八四五年出版）一書中給我們提供了關於英國無產階級貧困的悲慘情景。

馬克思曾在一八八〇年對法國工人作過統計調查的試舉。一八八〇年四月二十日在社會主義雜誌『統計評論』上揭載了由一百項問題構成的『關於工人的調查表』。

馬克思一八八〇年十一月五日在致郵爾格的信中寫道：『我編了……一個「問題集」，它最初發表在「統計評論」上，其後，它的單行本又大量傳播在全法各地』（馬恩全集，一九三五年俄文版，第ⅩⅩⅧ卷，九八頁）。

馬克思在這個『調查表』的前言中着重指出了法國的資產階級害怕藉助於統計資料而表示出和揭露出法國工人的真實情況。

馬克思寫道：『任何一個政府（君主的或資產階級共和國的）也沒敢對法國工人階級狀況進行一個認真的調查。但是反之，對於農業危機、財政危機、工業危機、商業危機、政治危機，却進行了多少次調查！』（馬恩全集，一九三五年俄文版，四九三頁）。

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法國的資產階級害怕『公平的、有系統的調查給它帶來危險……我們現在要以我們所有的為數不多的資金着手這種調查』（同前）。

馬克思通過雜誌、其後又用傳佈翻印的調查表的方法直接向法

國的工業無產階級和農業無產階級發出了號召。

馬克思寫道：『我們期望在這件事中得到一切城鄉工人的支持，因為這些工人知道：只有他們才能够充分知道這種事情而記述他們所體驗的那種災難……』（同前）。

馬克思着重指出過這些材料對工人運動的意義，他指示說：社會主義者們『……應該期望具有下述條件下的正確而肯定的知識，即工人階級（未來是屬於這個階級的）在其中工作着和進行着工人運動的條件』（同前）。馬克思所期待獲得的統計材料，首先就是應該為工人革命鬭爭任務服務的。

預定在『統計評論』發表一些專題論文，然後再集印單行本。

調查表是非常有趣的。首先是根據對資本主義社會工人階級狀況的科學理解而編製了工人的社會地位和生活情況各個方面的詳細調查。在調查表裡列入了那些足以標誌罷工運動發展情況、工會組織和合作社組織發展情況的問題。問題中大約有百分之四十五，是爲了究明勞動條件的，百分之三十五是爲了究明工人的物質狀況和法律地位的，百分之二十是爲了究明工人組織和合作社組織情況的。調查表中的問題是這樣擬訂的，即使調查表不僅單純地提供必要的材料，而且還是使它直接爲提高填寫者的階級自覺而服務的。

我們現在在下面引證幾個問題提法上的例子。

26. 在法律上應該允許企業主在發生事故時叫工人或其家屬賠償嗎？

27. 企業主懲罰過爲使企業主致富而工作時發生事故的人嗎？

69. 生活必需品（如：房租、食物、衣物、各種費用、捐稅）的價格如何？

71. 你們注意到最必需物品的價格較工資提高得更多得多嗎？

73. 請比較一下你們所生產的商品、你們所提供的服務的價格和你們的勞動的價格。

90. 請你們說一說你們的企業主爲了管理他的雇傭工人而規定的規章和罰款（見前書，四九五、四九八、四九九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提出了這樣要求，即使統計成爲廣大勞動人民、首先是工人階級易於接近和理解的東西，同時並企求使勞動人民親身參加，去建立自己特有的統計學，以之對抗那種掩蓋工人階級真實情況的資本家的統計學。

這些要求又在廣泛的新的基礎上由列寧和斯大林提出了並且實現了。

列寧在反動政權統治的年份中，在集聚黨和工人階級的力量以便進攻時寫道：『對於自覺的工人來說，認識自己階級的運動、它的本質、它的目的和任務、它的條件和實踐形式，是最重要的任務……我們必須用一切力量去搜集、檢查、研究那些客觀資料，即不是關於個別的人或一些人、而是群眾的行爲和心情的資料，從各種報紙上、敵人的報紙上摘取出來的資料，一切識字的人都能檢查的資料』（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卷，三五五——三五六頁）。

列寧、斯大林也和馬克思、恩格斯一樣，認爲工人給自己的工人報紙寫通訊，是有很大的意義的。在『火星報』和其他一些布爾什維克刊物上，加工並刊載了許多標誌工人狀況的事實和數字。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爲在第一國際組織內經常進行工人統計工作是必要的。工人階級的統計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倡議和領導下第一次在第一國際組織中發生的。

關於統計工作的組織問題和關於據以填送材料的指標的問題，曾在第一國際的若干次代表會議上和代表大會上討論過。

馬克思在給日內瓦大會代表們寫的指示中指出過：『對全世界各國工人階級的狀況進行統計調查，而這種調查又應有工人階級自身參加，乃是我們將要提出的巨大措施之一』（馬恩全集，一九三六年俄文版，第ⅩⅢ卷，第一冊，一九六頁）。

馬克思製訂了工人統計組織的大綱和『調查大綱』，即應按它



搜集材料的提綱。組織計劃和調查計劃在同一指示中也指出過了。

馬克思寫道：『……我們提議如下：

凡是我們協會設立支部的每一個地點，都立即着手工作並按提出的調查大綱中指出的各點搜集材料！（同前）。』

馬克思建議：大會要號召歐洲和美國的一切工人都來『……參加搜集關於工人階級的統計材料……』（同前）。』

接着馬克思敘述了資料加工順序和如何利用。『……報告和材料應送中央會議。中央會議應根據這些材料編製總報告，並在總報告後附上作為附錄的材料』（同前）。馬克思建議把包含着最重要資料（工人階級狀況及工業發展情況）的綜合表的報告在每次大會上討論，並在通過後出版，以期使統計材料成為盡量廣泛的勞動人民的所有物。

馬克思在編製調查大綱時指出過：必須根據各國的發展條件去變更提綱上的問題，必須把問題具體化，以適合於各國發展的特點。馬克思曾在提綱的標題上強調過這一點。把它叫做：『一般調查大綱（各地可以加以變更）』（同前）。』

一八六六年召開了第一國際日內瓦全世界代表大會。在大會的決議中說過：『對一切文明國家中的工人階級狀況進行有工人階級自身參加的統計調查，乃是「國際的統一行動」的巨大措施之一』（第一國際歷次世界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的會議記錄。倫敦代表會議，一九三六年俄文版，一八〇頁）。

馬克思所提議的，並經日內瓦世界代表大會通過的調查大綱，是由下列各項問題構成的：（1）生產的名稱；（2）生產中從業人員的年齡和性別；（3）從業人數；（4）工資；（5）工作時間；（6）吃飯休息時間；（7）手工工廠的狀況和工作條件；（8）工作對工作者生理狀態的影響；（9）道德條件；（10）生產的狀態。

在第一國際的章程（日內瓦代表大會通過的）中，有一章是專門規定『工人階級全般的統計』的。爲了進行統計工作，曾採取了關於在每一個「國際」支部內設立專門統計委員會的決定（已列在這一章中）。

在一八六九年的巴塞爾代表大會上，通過了『關於勞動統計問題』的決議，在這項決議中極其堅決地強調了必須使『國際』的一切成員都知道『……各國的勞動人民狀況和工業情況……』（第一國際歷次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會議記錄，巴塞爾代表會議，一九三四年俄文版，八六頁）。

代表大會向一切工人團體建議，要他們向總會報告『……盡可能更詳細的統計資料：每種專業的工人數、工資水平、產品成本和價格、工人不滿的原因以及其他一切能在每一工業部門中搜集到的、關於原料和市場方面的材料』（同前）。

正如我們從這個問題表中看到的一樣，工人的統計應該提供極廣泛的材料，它要說明每個國家的工人階級在生產中的地位和工業的情況。這種統計應該是爲工人的『自覺』服務的，即爲提高工人的階級意識服務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盡了一切力量，使日內瓦代表會議和巴塞爾代表大會的決定付諸實現。在第一國際倫敦代表會議（一八七一年召開的）上，馬克思提出了總會關於進一步改善工人統計組織的提案。

馬克斯說：『代表會議建議總會實行章程第五條（即實行全般的工人階級統計），以及實行日內瓦代表大會關於該問題的決定』（第一國際歷次代表大會，代表會議會議記錄，倫敦代表會議，一九三六年版，二九頁）。

馬克思在這次代表會議上着重指出了把關於工人罷工運動資料集中交給總會的必要性。我們從會議記錄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得到了許多代表的堅決支持，他們都指出了第一國際必須實行全般的勞動統計。

五十年後，當我國的工人階級在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下實現了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並開始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社會時，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奠基者和領袖列寧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月寫的）一文中，作為重要任務之一而提出了將統計灌輸到群眾中去的要求：『……把它通俗化，使勞動群眾逐漸地學會親自瞭解並看到應該如何工作，工作多少，怎樣休息，休息多久，使……經濟成績的比較，成為大家注意和研究的對象……』（列寧文選兩卷集，莫斯科外文出版局中譯本，第Ⅱ卷三九〇頁）。

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條件下，組織全般的工人階級統計原是不可能的。只能努力獲得一些個別的不充分的材料而已，但這些材料在那時也是很有價值的。

建立全般的工人階級統計，只有在蘇維埃國家裡，在列寧、斯大林的領導下才第一次實現了。

×

×

×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提出過這樣的要求，即要求我們必須從現象的相互依存關係中去具體研究現象。這種要求是馬列主義統計學的極其重要的原則之一。這正和資產階級的統計學相反。資產階級的統計學是在那種否認自然和社會客觀發展規律的反動觀念論哲學中尋找依據的。

依資產階級的統計學看來，世界——這是偶然現象的大混沌狀態，而機率論——就是研究這種大混沌狀態的唯一可能的方法。按照資產階級的英美統計學派鼻祖皮爾生的論斷來說：世界的本質是不能被認識的，科學並不能回答為什麼發生某某現象這一問題，它只能記述某某現象是怎樣發生的。

恩格斯一八八八年關於以社會過程的記述來代替社會過程的研究這種企圖，曾經寫道：『爲了叫你看看經濟科學已經墮落到什麼地步，我現在舉出布林坦諾來說一說……他宣布：一般經濟學或理



論經濟學那種東西，一點兒價值也沒有；一切力量都在於專科的或實踐的經濟學裡。我們應當像在自然科學裡一樣，只止於記述事實』（馬恩全集，一九四〇年俄文版，第X V 卷，第五八頁）。恩格斯使人信服地指明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害怕分析資本主義的現實，他們用單純的經驗論來代替分析，用搜集事實和記述事實來限制科學。

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們，在應用統計時，都非常注意統計觀察的合理組織問題和統計觀察結果的估價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過資產階級的政府統計組織中的缺點。對於上述情形，我們可以指出恩格斯在批評德國政府機關的所謂『普查』和『調查』時，曾揭露了使統計的質量趨於低下的原因。『我們非常詳細地知道官僚主義的老一套：把調查卡片分發出去，不管如何只要添上送回來就已滿足了……』（馬恩全集，一九三六年俄文版，第X Ⅲ卷，第一部，二二七頁）。

恩格斯不僅着重指出了政府統計組織自身存在的、以形式主義態度對待資料的搜集這種情形，而且還指出了資料缺乏客觀性。『……爲了獲得資料（調查卡片就是根據這種資料添寫的），差不多總是恰恰求助於那些爲自己的利益而隱蔽真理的人』（同上）。這種組織制度即使在今天也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統計的一個特點。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大多數的情形，都不得不利用那些已在統計表中經過綜合的統計數字。但當他們有原始資料時，總是親自去編製統計表。

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採用平均數，把它當作綜合資料的一個手段。

現在我們舉幾個應用這種平均數的例子吧。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寫道：『在英國資本家之間，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就是稱比利時爲勞動者的樂園，因爲「勞動的自由」或者——結局不外是同一事——「資本的自由」，在比利時沒

有受工會之專制的妨害，也沒有受工廠法的妨害。我們且就比利時的「自由的」勞動者的「幸福」一說吧』（資本論，郭、王合譯本，三聯版，第一卷，五六七頁）。

馬克思採用了關於標準工人家庭標準家計收支的資料，並引用了下述的全家年度收入的計算：

	一月的工資	三百勞動日的工資
父	1.53佛郎	468.00佛郎
母	0.89	267.00
男兒	0.53	168.00
女兒	0.55	165.00
合計		1038.00

（以上見前書同頁）

馬克思把工人家庭標準收入額（一年爲一〇六八佛郎）與水夫、兵士、囚徒所攝取的標準榮養平均年度價值作了一個比較，引證了下面的表。

如果勞動者攝取以次各種人的榮養，則這一家的年收入，就表示這樣的不足：

水夫的榮養	1828佛郎	比較不足	730佛郎
兵士的榮養	1473佛郎	比較不足	459佛郎
囚徒的榮養	1112佛郎	比較不足	44佛郎

（以上見前書五六八頁）

把一個家庭的平均收入與水夫、兵士、囚徒的標準榮養平均支出作一個比較，就使馬克思能够指出『自由的』比利時工人的『幸福』來，即比利時工人的榮養甚而比囚徒的榮養還壞。

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指出了除了一般的平均數之外，還需要計算和引證部分的組別的平均數，也就是說，他們提出了科學地利用平均值這種最重要的要求。

例如，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指出過：『根據

……總登記所的報告來看，在全部英格蘭和威爾斯，死亡率差不多每年達百分之二點二五，即每四十五人中每年有一人死亡……一八三九至一八四〇年的平均標準就是這樣……」（馬恩全集，一九三〇年俄文版，第Ⅱ卷，三九八頁）。這個總平均值掩蓋着很大的差別。『但在大都市裡，死亡率却完全是另一種情形』——恩格斯這樣着重指出，並研究了依工人生活條件為轉移的死亡率：『……在曼徹斯特……一人死亡事件……對30.75（居民——卡註）；在利物浦……為1對 29.90……在愛丁堡，一八三八——一八三九年為1：20，而在一八三一年……則為1：22，在格拉斯高……一八三〇年平均比率為1：30，但在若干年後則為1：22……」（同前）。

恩格斯着重指出了平均死亡率掩蓋着一種事實，即上層的和中層的階級中的人死亡率較低於工人階級中人的死亡率。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着重指出過：總平均值掩蓋着差別，因此對於質量相同的組必須應用組別平均值。關於這種要求，我們可在馬克思所著『工資、價格與利潤』一書中引證過的下述計算中，得到明顯的證明：

馬克思寫道：『假定有十個工人，每人每週領二先令，有五個工人每人每週五先令，另有五個工人，每人每週十一先令，那麼這二十個工人每週一共應得一百先令或五鎊。如果其後，他們的每週工資總額提高了，假定提高了百分之二十，這時，所得總額將由五鎊提高到六鎊。如果取其平均值，我們就能夠說：工資的一般水平提高了百分之二十，縱使實際上十個工人的工資仍然不變，一個五人組……的工資僅由五先令增到六先令，另一個五人組的工資共由五十五先令增加到七十先令。但半數工人的狀況根本沒有改善……」（馬恩全集，一九三六年俄文版，第Ⅱ卷，第一部，一〇六頁）。

資產階級統計想靠總平均數去掩蓋真實情況這種企圖已被馬克



思和恩格斯無數次地揭穿過了。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注意到了男子勞動愈來愈被做同樣工作只得更低工資的婦女和兒童的勞動所代替。工廠主對於男子勞動的被排擠矢口否認並發表這樣的統計表：『……用一些嚇唬無知者而又不能給有經驗的人提供任何證明的平均數字來混淆……』（馬恩全集，一九三〇年俄文版，第三卷，四三—頁）。

（二）包在內的平均數是一種非科學的方法，它是捏造事物的方法之一。我們已經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批評過了這種方法。列寧和斯大林特別強調過：在經濟分析中只用一種總平均數是不能容許的。列寧曾指出過計算組別平均數的必要性。斯大林在其著名的指示（必須計算訂正平均數）中發展了列寧的這一原理。

馬、恩、列、斯教導我們說：在研究某一問題時，不能只滿足於問題的個別方面的解決，必須取其能標誌社會現象的全部事實，而不取其個別的事實。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取用統計指標時，並不是孤立地，而是在相互聯系中摘取。例如馬克思當說明愛爾蘭農業僱傭工人狀況的特徵時，按愛爾蘭救貧法監督官的報告資料，在比較資料而得到了與『政府官員』試圖證明的那種情況相反的真實情況。

馬克思寫道：『據他們說，農村地方的工資率，仍極低下，而這低下的工資率，還算經過了最近二十年間百分之五十乃至六十的昂騰。現今一週間的平均工資，為六先令乃至九先令。然而隱在這外表上昂騰之背後的，是現實工資的低落……』（資本論，第I卷，三聯版，六〇〇頁）。馬克思指給我們：工資的提高落後於物價的迅速增長。

馬克思把生活費的上漲和工資的增大加以比較之後，便根據這種比較作出了下面的結論：『與二十年前比較起來，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已足為兩倍，而衣類的價格，也恰為兩倍……單是比較……工資率，也不會給予我們以正確的結論』（同前書，六〇一頁）。

如所週知，在研究某一過程的發展特點時，僅僅比較絕對水平，是不夠的，這個問題，在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裡，已得到了更加廣泛的闡明。

在『工資、價格與利潤』一書中引用了下面的例子：『如果一個人每週得到工資二先令，其後提高到四先令，那麼工資水平就是提高了百分之百。這似乎是很大一塊東西……縱使實際工資額每週四先令仍然是少得可憐……因此，不要用聲名很大的工資提高率的數字來迷惑自己。總要問一問：最初的工資額是怎樣的？』（馬恩全集，一九三六年俄文版，第ⅩⅢ卷，第一部，一〇六頁）。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給英、美、德等國的報紙寫的論文中，敘述經濟生活各方面特徵的經濟統計提要，佔着很大的地位。這些提要如把它們當作從政治上深入闡明經濟問題的一種典範來看，是非常有趣的。而且，這種闡明又是以簡潔的使大多數讀者易於瞭解的形式進行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使經濟生活的研究服務於下面的基本任務的：即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存在的敵對矛盾的增長。資本主義在工業、農業和其他部門中的發展情況，又以證明工人階級地位惡化的材料補充起來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結論裡，根據廣泛的統計材料，給我們以關於各種統計指標的內容和如何利用的非常重要的指示。

馬克思在九十多年前發表於『New York Daily Tribune』（一八五七年，第四九九九號）上的『英國工廠制度』一文中，曾揭露了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特點。

爲了研究工廠數目的增長情形，馬克思曾按各種紡織工業計算了平均每年的總增長情形，作爲一個算術平均數，並寫道：『就這樣，工廠的平均每年增加數（一八三八年到一八五〇年間是三十二個）在一八五〇年到一八五六年間（這時工廠增加數達八十六個）差不

多增達三倍（馬恩全集，一九三三年俄文版，第Ⅰ卷，第一部，九五頁）。

馬克思按各個縣研究企業數目的增加數和減少數時，指出過：支配着這種變化的一般法則就是集中化的法則。

英國工廠制度的概要敘述，以研究資本主義在工業中的發展對工人狀況所起影響而結束了。

馬克思在引用一八三八年和一八五六年工人人數的統計資料時，指出過：雖然工廠數目增加了，但從業工人數却大大減少了。生產過程的機械化，使工廠主有可能去擴大使用更低廉的兒童勞動和婦女勞動。正如馬克思指出過的——樣，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是資本主義應用機器時的第一句話。

我們指出下面這一點，也是很有意義的：縱使按資產階級的統計資料來看，婦女的很大差別待遇，在一百年後的今天，也仍然繼續存在着。現代英國的女工，和男工做一樣的工作，但只領取男工工資的百分之五十到五十五。

馬克思和恩格斯靠着統計數字成功地指出了資本主義下工人階級的真實狀況。

列寧曾把馬克思的『資本論』稱為『……社會現象研究中嚴肅客觀性的最卓越的典範之一』（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卷，四九八頁）。

資產階級的學者們怪罪馬克思『敘述得乾燥』，特別是把這種非難與『資本論』中充滿了統計兩者聯繫起來。馬克思在自己的研究中所運用的統計，是結論的不可動搖的事實根據。

列寧堅決駁斥了認為『資本論』似乎是一本乾燥的經濟論述的胡說，並指出說：像馬克思這一基本著作那樣『有情感』的著作是沒有的（同上）。

『資本論』裡有很多標誌資本主義社會敵對矛盾的增長情形，描繪工人階級悲慘狀況的統計資料。現在我們從馬克思引用的無數



統計表中找一個來看吧（參閱馬克思『資本論』，郭、王合譯本，三聯版，第I卷，三七九頁。

各產業所使用的 各種年齡的工人 數	在健康方面互相 比較的產業	各種產業每十萬人中以年 齡為區別的死亡率		
		自25歲至 35歲	自35歲至 45歲	自45歲至 55歲
958,285	英格蘭威爾斯的 農業	743	895	1,145
(男) 22,301 } (女) 12,379 }	倫敦裁縫業	958	1,262	2,093
13,803	倫敦印刷業	891	1,747	2,367

馬克思用困苦不堪的住宅條件，特別是用繁重的生產條件說明了倫敦工人的高度死亡率。

馬克思寫道：工人住宅的狀況『……雖最幻想的著作家的最不快意的幻想也比不上』（同前書，三七八頁）。

馬克思除了引用能標誌工人階級狀況的材料外，還引用了那些足以證明財富向少數（相對地來說）資本家集團手裡集中情形的數字。

例如，馬克思關於英國國民生產物的分配情形寫道：『如果你們考慮到國民生產物的三分之二僅由居民的五分之一來消費（據某下院議員不久前肯定地說：甚而只由七分之一的居民來消費），那麼你們就會明白：國民生產物中會以多麼巨大數額的奢侈品的形式生產出來，或者應去交換奢侈品，又有多麼巨大數額的生活資料被從僕、馬、貓等浪費掉……』（馬思全集，一九三六年俄文版，第XII卷，第一部，一〇一——一〇二頁）。

列寧在研究帝國主義發展的特點時，根據大量統計材料指出了敵對性矛盾日益增長的情形、勞動人民被剝削和貧困化的增長情形。列寧寫道：『工人絕對地貧窮下去，即簡直是比以前更窮些，不得不過更壞的生活，吃更壞的食物，更加吃不飽，住在地下室和棚頂

室裡』（列寧全集，第四版，18卷，四〇五頁）。工人的絕對貧困化也伴同着相對的貧困化。『但是，工人的相對貧困化，即他們在社會收入中所佔比重的縮小情形，更是顯而易見的』（同書四〇六頁）。

把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記述的時期的資料和現代的統計資料對比一下，就會指給我們：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一百年間，工人的狀況並沒得到改善，相反的，由於剝削方法的『改進』，反倒大大惡化下去。

按照故意大打折扣的資本主義統計資料來看，美國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消耗在奢侈品上，同時美國每一個家庭就有一個挨餓的人。失業大軍不斷增多着。工人階級的很大一部分陷於完全失業和部分失業狀態。

斯大林同志在述說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階級狀況時指出過：『不僅失業工人苦於失業現象。而且在業工人也苦於失業現象。他們所以苦於失業現象，是因為大批工人失業的情形使他們在生產中的地位不穩，使他們朝不保夕』（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外文出版局中譯本，五一六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在經濟研究中和在論述各種經濟問題、歷史問題、政治問題的論文中利用了統計，另一方面也把統計當作打擊資本主義的武器而應用在黨的極重要的文獻裡。

馬克思在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中，向着全世界的工人，引用了一些詳細的資料，證明『……由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六四年工人群眾的貧困並未減輕，縱使按工業發展和商業增長來說，這一時期是無與倫比的』（馬恩全集，一九三六年俄文版，第ⅩⅢ卷，第一部，五頁）。

馬克思揭露了英國政府想要以『統計數字的舞蹈』、以『國民進步』的一般考察、藉助於收入和工資的總平均數去掩蓋工人真實狀況的企圖。馬克思以嘲笑的語氣談過某財政大臣的『粗野的狂歡』

，這個財政大臣曾宣佈過一八四二至一八五二年全國收入增加百分之六，一八五三至一八六一年間增加百分之二十，並作出結論說：『……英國工人的狀況平均都得到了很大的前所未有的改善……』（馬恩全集，一九三六年俄文版，第ⅩⅡ卷，第一部，七頁）。馬克思把政府的資料和從此得出的結論稱為『官方的自誇』，相反的，馬克思提出了大量的、各方面的普查材料、稅收統計材料、『藍皮書』、貧民院和孤兒院的報告等等，並根據這些材料使人信服地指出：財富和力量的增加僅僅限於有產階級。

馬克思以驚人的巧妙方法，用英國政府的統計資料去反駁政府本身。

馬克思在這個告工人的宣言中指出了勞動與資本間的矛盾的不可調和性，並指示出消滅工人貧困和無權地位的途徑：『……土地和資本的主人們常常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權去衛護自己的經濟獨佔並使它永存下去……因此，奪取政權便成了工人階級的偉大義務』（同前書，十二頁）。

× × ×

研究馬克思從俄國的資料中摘引的統計資料的提要、拔萃、計算，是有很大大興趣的。這些提要使我們能夠確定馬克思和列寧對農奴解放後俄國經濟的研究方向和方法的共同性。

從這種比較看來，經濟理論對統計學的意義，就特別明顯了。關於被研究的過程的性質，既然有了相同的觀念，那就必然會在研究實際材料時運用基本上相同的方法。

在『馬恩文存』第ⅩⅠ卷裡，發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爲了研究俄國一八六一年農奴解放和農奴解放後的發展情形而寫的拔萃和計算的一部分。

特別使人感到興趣的是根據車爾內舍夫斯基、斯卡金、楊松、英格卡特著書而寫的拔萃和計算（他們的著作列寧也利用過）。

馬克思曾特別注意車爾內舍夫斯基的著作：『幾封公開信』，



在這本書中對一八六一年農奴解放的性質有過詳細的分析。列寧曾經寫道：『爲了在農民改革正進行的時候那樣明瞭地瞭解農民改革的基本的，資產階級的性質，爲了瞭解當時俄國「社會」和「國家」已由那些堅決敵視勞動人民和無條件地注定農民破產和農民被徵發命運的社會階級君臨支配着的情況，所以才正是需要車爾內舍夫斯基的天才』（列寧全集，第4版，第一卷，二六三頁）。

馬克思在詳細摘要抄引了車爾內舍夫斯基對一八六一年農奴解放的階級本質所作說明之後，便轉過來研究那些說明農民『解放』結果的統計資料。

馬克思首先指出了車爾內舍夫斯基所利用的材料是什麼。這是『委員會的著作』，這些著作所包括的，是擁有一百人以上的地主的統計資料。這些資料提供了每一領地的人數和每戶所有土地數，提供了領地的土地總數、每種附屬地數、納租額等等。馬克思指出過：車爾內舍夫斯基把自己的著作『……局限於大俄羅斯省份內……這些數字充滿了四卷書。他在每本書裡都僅僅取用幾個代表某些平均條件的縣份』（『馬恩文存』，一九四八年俄文版，第Ⅴ I 卷，一六頁）。

爲了在選擇某些縣份以標誌全體時不致陷於某種任意選取之嫌，車爾內舍夫斯基應用了抽樣法。關於這一點馬克思曾經寫道：『……他抽出這樣的縣份，即每十個縣中的第一個，也就是第一、第十一、第二十一等等縣』（同前書）。

馬克思總計了車爾內舍夫斯基所得到的一切數字：『……他爲了研究數字而抽出了十八個縣。

在出租出稅的所有地上的人口總數，按十八個縣全體來算是一二萬五千三百二十四人。

他們以前的份地是四十一萬九千四百零六點五俄畝……全部租金……在農奴制度下，他們向地主支付了八十四萬二千七百二十八盧布五十哥比』（同前書，十六——十七頁）。馬克思着重指出說：平均來看，每一俄畝份地從農民手裡徵收了二盧布零九哥比。但在

農奴解放後，按法令規定應從以前的份地中返還地主十萬零一千七百六十七點七五俄畝，剩在農民手裡的，是三十一萬七千六百三十八點七五俄畝。對於它們，規定了七十三萬一千三百四十六盧布八十哥比的租金。『也就是說——馬克思寫道——農民對自己的每一俄畝份地，應該按新法令支付二盧布三十點五哥比。

換句話說，按新法令規定，被解放的農民原在農奴制度下應支付地主一盧布時，農奴解放後就應向地主支付一盧布十哥比了（同前書，十七頁）。

對於車爾內舍夫斯基的一八六一年農奴解放的分析，馬克思給與了很高的估價。十年之後，在對許多資料（說明農民『解放』結果的）進行了詳細研究之後，馬克思又重新在其手稿『關於俄國廢除農奴制度問題』中說到了車爾內舍夫斯基所指出的農民『解放』的特徵。

馬克思在摘要記述俄國自由主義者們的著作時，主要是注意那些表現俄國經濟情況的事實和數字。

馬克思對於研究斯卡金所著『在僻地和首都』一書（一八七〇年出版）中的實際材料，非常注意。他所以這樣注意，是因為『斯卡金幾乎就成了第一流的作家，他根據廣泛的事實和詳細考察鄉村的一切生活，有系統地指出了農奴解放以後農民的貧困情況……』（列寧全集，第四版，第2卷，四六三頁）。斯卡金特別詳細地談論了農奴解放的主要問題——份地與支付金。

在馬克思從斯卡金的書中拔抄出來的拔萃中，詳細抄錄了確定平均每人租金額的制度。『編輯委員會』力求在確定租金額時，不僅因地主交出了農民的土地而要給地主以賠償，而且還要對損失農奴勞動而給以補償。

馬克思着重指出了那些為確定平均租金額奠定基礎的數字，是從『……地主、地主的管事人和領地管理人的虛偽書面聲明中……』（馬恩文存，一九四八年俄文版，第X I 卷，一二九頁）搜集的。在

計算平均租金時，編輯委員會把與此無關的苛稅也包括在租金裡了，這就使平均數大大提高起來。馬克思指出說：材料的搜集是有偏見的，因為這種材料只包括着擁有農奴一百人以上的領地。

馬克思在摘要中特別着重指出了那些明顯表現着農民『解放』的階級性的材料。

列寧和馬克思一樣，也注意了這些數字，並且也利用了斯卡金著作中的同一實際資料，並着重指出說：由於一八六一年的農奴解放，『法令』中所規定的較高的份地却比改革前農民手中所有的實有份地還低。列寧引證了斯卡金書中的文句，即在這些文句中指出了：確定租金額大小的，是『真正的地主、地主的管事人、領地的管理人的材料，即隨便製造出來的毫不可信的資料』（列寧全集，第四版，第2卷，四六五頁）。列寧在引證這一文句時寫道：由於這個緣故，『……編輯委員會所作出來的平均租金就高於實際的平均租金』（同前）。

列寧也和馬克思一樣，特別注意了徵稅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上層階級支付全部捐稅的百分三十七，而下層階級支付百分之七十六。

×                      ×                      ×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立和發展先進的統計科學上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統計學已被用來為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服務了，為工人的『自覺』服務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確定了統計學這門社會科學的內容，指出了它在科學分析中的地位。他們與那種使統計學與經濟學脫離的現象進行了鬥爭，第一次揭露了統計學的階級性，在統計科學史中第一次作了建立工人階級統計的試舉，力求使統計成為勞動人民的所有物。在實際資料的經濟統計分析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們，發展了各種基本的統計方法。馬克思主義奠基者們向前發展統計科學，這是與統計科學在經濟研究實踐中的應用直接聯系着的。



在『資本論』中，第一次爲了對一定社會生產方式和內在於這種生產中的社會關係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全面經濟研究而應用了統計。

對生產過程進行全面的經濟統計研究，這種理想乃是結合工業統計、勞動、農業、財政、商業等等統計的中心任務。這門科學的更進一步的基本階段，是由列寧的一些著作決定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等等）以及由斯大林同志的各種經典著作（說明社會主義在蘇聯的發展和勝利的著作）決定的。

斯大林同志在關於語言學基本問題的天才著作中尖銳地批判了曲解馬克思主義的書呆子和教條主義者們，『……他們所看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字句，但不看它的本質，他們背誦馬克思主義的結論條文和公式，但不理解它的內容』（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斯大林同志所給與的批評，對於統計科學的進一步發展來說，是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的。這種批評要求我們以布爾什維克的態度爲徹底地創造地掌握馬、恩、列、斯著作中統計學的基礎和應用方法而鬥爭，爲深刻地研究統計學中的馬列主義而鬥爭。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精通馬列主義理論，——這就是說要領會這個理論底實質，要學會在無產階級鬥爭各種條件下，在解決革命運動底實際問題時運用這個理論』（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外文出版社中譯本，四三四頁）。

（陳東旭、趙克成合譯自蘇聯『統計通報』一九五〇年第5號）

# 列 寧 與 統 計

皮 撒 列 夫

偉大的革命天才，布爾什維主義的創始人和歷史上第一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創始人烏拉第米爾·依里奇·列寧逝世以來，已經有二十五年之久了。列寧和斯大林的學說，已成了全世界勞動者爲從資本主義奴役下爭取自己的解放而鬥爭的指路明燈。已掌握了群衆的列寧、斯大林思想，已成爲偉大的改造力量。列寧主義——這是全世界千百萬勞動人民的旗幟。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斯大林同志在第二次全蘇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演說中，明確地指出了永垂不朽的列寧的偉大。斯大林同志說：『列寧的偉大首先就在於：他創建了蘇維埃共和國，從而在事實上證實給全世界被壓迫的群衆：解放的希望儼存無恙，地主和資本家的統治已經朝不保夕，而勞動的王國可以由勞動者本身的努力來創建，並且，應該在大地上，而不是在空中，創建起勞動的王國。』

關於做爲一種認識的武器，做爲國家管理和共產主義社會建設之武器的統計，在馬列主義的寶庫裡，蘊藏着列寧和斯大林的深邃的論述。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規定了馬克思主義統計學和實踐的新的發展階段。這些著作，標誌出統計學的最深刻的變革。以列寧和斯大林爲其創始人的蘇維埃統計的發生與發展，在統計的發展史上，開闢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在馬列主義這一堅固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統計，形成了共產主義建設的武器。

在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中，一切最重要的統計問題都已經得到

了解決。祇有在深刻研究馬列主義的基礎上，才可能進一步有效地研究蘇聯的統計理論，並對其豐富無比的、多方面的經驗，科學地加以推廣。

列寧早在青年時代，當研究俄國經濟時，已經使用了統計的原始資料。聯共（布）中央馬恩列學院編纂的『列寧生活與事業概觀』一書中曾經指出：『列寧決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書齋式的、抽象的接受者。對列寧來說，無論何時，馬克思主義都不是死的教條，而是活的革命運動的指南。列寧在二十歲的時候，一面傳播馬恩學說，一面着手於俄羅斯的經濟與政治發展的深刻研究。列寧洞悉民粹派份子的經濟研究。他曾檢查了並獨自整理了民粹派份子們作為謬論根據的一切實際材料。列寧進行了統計工作，並研究了許多有關俄羅斯經濟情況的材料，特別是關於農民經濟的地方自治機關統計資料』（註1）。

A. И. 斯克里亞林克受列寧的委託，會對沙瑪爾縣的三個鄉村進行了統計調查。但是，這次調查中的農戶調查卡片却是由列寧自己編製的（註2）。

根據這些調查資料而編製出來的統計表，保存並發表於 И. И. 烏里亞諾夫的回憶錄附錄中。烏里亞諾夫在一八九三年曾把這些表格為自己抄寫了一份。烏里亞諾夫在其回憶錄中曾寫道，這些表格是根據列寧的總計劃編製出來的（註3）。

現在我們簡單地談一下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材料，因為廣大的統計工作者們對於這些材料還沒有足夠的認識。

在關於沙瑪爾縣的杜波渥——烏米特鄉、涅斯克萊辛鄉和托梅勞夫鄉的二十個村的統計表中，明顯地反映了農民階層分化的情況。

---

註1：『列寧的生活與事業概觀』1944年，11頁。

註2：同書，12頁。

註3：參閱聯共（布）中央馬。恩。列學院選集——『1889——1893年列寧在沙瑪爾城』。『回憶錄選集』，黨出版局，1933年。



這些村中共有三千四百六十二戶，按其耕種情況可細分為六組：

1、未耕種者；2、耕種一俄畝以下者；3、由一俄畝到二俄畝者，4、由二到四俄畝者；5、由四到十俄畝者；6、十俄畝以上者。最高的一組（耕種十俄畝以上者）只有二百一十七戶，為總數中的6.2%。現在我們引用如下的資料，去說明最高的第六組的情況（前五組的資料並未各別發表）。

組別	耕種俄畝數			按耕種戶平均數	穀物收穫量	其中人口數
	自有土地	租用土地	計			
前五組……	8,239	2,927	9,193	2.8	575,975	19,814
第六組……	1,889	3,335	5,224	24.0	357,125	2,185
合計……	8,158	6,262	14,420	4.0	933,100	21,979

對合計的百分比

第五組……	77	47	64	—	60	80
第六組……	23	53	36	—	40	10
合計……	100	100	100	—	100	100

由上表可見：所有耕種土地的36%被集中在6%的農戶手中，其中耕種的53%乃係租用土地，這一組，佔農村人口的10%，但却握有了40%的收穫量。

列寧其後在其名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當解釋沙瑪爾省諾握烏真縣的地方自治機關統計資料時，寫道：

『……事實正確地證明了：在「土地公社社員」中已有資本主義性農業的發展，臭名遠揚的「公社關係」完全適合於大土地經營

者的雇農經濟』（註4）。

從列寧領導下的青年馬克思主義小組收集了這些統計資料時起，已有五十六年之久了；這些統計資料說明了土地公社農民的尖銳階級區分。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列寧——斯大林黨曾對農民經濟進行了最激底的改革。在五十多年以前，由斯克里亞林克所調查的二十個土地公社中的十八個土地公社，現在已組成了十四個村蘇維埃，它們散佈在奎比舍夫省的三個區裡，即莫洛托夫區、杜波渥——烏米特區和恰帕耶夫區。毗隣恰帕耶夫市的兩個村莊已被劃入該市範圍之內。現在，在十四個村蘇維埃內已有二十九個集體農場和三個拖拉機站。——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學年度（由一九四八年夏到一九四九年夏——譯註）初，在這些村蘇維埃下已有九個小學校，六個七年制學校和三個中學校，其學生總數為三千二百四十八名。在這些學校中已有一百二十九名教員和講師在工作着。在這些地區內已有兩個醫院、三個區中心產院、五個診療所、九個藥品調劑所、三個集體農場場員的產院、一個兒童問題諮詢處、一個固定托兒所。在這些設施中服務的，有七個醫師和四十三個中等醫務工作人員。在村蘇維埃下設有一個文化館，六個農村俱樂部、一個集體農場俱樂部和七個鄉村閱覽室。在上述各設施內的書籍，共有三千五百冊。村蘇維埃的工業，計有五十六個各種不同的企業，其中尚包括兩個電站（註5）。以前曾是資本主義殘酷剝削對象的勞動農民，今天已沿着富裕文明的集體農場的生活大道前進着。

兩個世界——社會主義世界和資本主義世界——在這些無需多加解釋的數字中，就已反映出來了。

在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中，是把統計學當作一種有黨性的、有階級性的科學而提示給我們的。

列寧著作中的一切統計表、一切統計計算，從其頭一個數字起

---

註4：『列寧全集』，第3卷，第59頁，第3版。

註5：這些資料，係由奎比舍夫省統計局提供給著者的。

直到最後一個數字止，都有其偉大的目的；所有這些數字都充滿對腐朽的資產階級科學的偉大的不可調和性。所有這些數字都是爲使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作戰獲勝的事業而服務的，而在勝利以後，則又是爲共產主義建設的事業而服務的。

在列寧與斯大林的著作中，具備了各式各樣的、對統計材料加以政治經濟分析的卓越典範。這種分析所具有的深度與多面性，它所包括的社會經濟現象範圍之廣泛，及其以統計資料的縝密分析爲基礎的遠大科學預見，在科學史上是無與倫比的。當列寧與斯大林分析統計材料時，曾無數次地闡述了統計科學的基本問題與決定性的問題。這些闡述，以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觀點來說，乃是解決了統計學基本問題的輝煌範例，它決定了統計學上的真正的大變革。這些闡述使統計學變成了真正的科學，從而使它成了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中，對資產階級的統計學會給予毀滅性的批判，曾揭露了資產階級統計學基礎的腐朽性、無力性及其辯解性的本質。在這些批判中包含着有關下述問題的一系列最重要的指示，即真正的科學馬克思主義統計學應當是一種什麼樣的東西。

在列寧的最早一篇論文『農民生活中的新經濟動態』（在一八九三年寫成的）中就已包括着對胞斯特尼可夫的『南俄農民經濟！』一書的深刻批判。該書作者胞斯特尼可夫的論述是以塔夫利契縣、謝爾孫縣和耶卡切里諾斯拉夫縣關於農民經濟的地方自治機關統計研究爲根據的。列寧會對該書中記述事實的那一部分，即根據豐富材料證明了農民中存在着階級分化的那一部分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然而，列寧却駁斥了自由主義民粹派的結論和胞斯特尼可夫的命題。

列寧在這本早期著作中，就已作出了對社會主義經濟統計具有頭等意義的許多指示。列寧在其活動的這一早期時代中，就已經成了地方自治機關統計的博學之士了，這種農村統計，曾是列寧對當時俄羅斯國民經濟中所發生的各種過程的真實本質進行經濟分析的出發點，列寧在該書中寫道：『地方自治機關統計能够提供出關於



農民經濟情況的大量而詳細的材料』（註6）。

克爾日扎諾夫斯基在其回憶錄中寫道：『一八九三年，當列寧出現在彼得堡的時候，他的最初的幾次言論，就已經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強烈的印象。

我們之中的任何人，也不可能那樣完善地把對馬克思的深刻瞭解應用於當時我們全體所關心的俄羅斯經濟問題上去。我們之中的任何人，也不能在那種程度上熟悉這種經濟研究的原始資料，以及在那種程度上熟悉俄國地方自治機關統計方面的豐富材料。就分析階級之現有力量的廣度與深度來說，我們之中的任何人也不能與之相提並論』（註7）。

列寧在其全部活動過程中，在自己的許多天才著作裡曾經最廣泛地利用了統計材料。列寧以令人驚服的精力利用了、並批判地研究了和精細地解剖了難以數計的俄國、英國、德國、美國、法國、丹麥和其他各國的大量統計出版物。

列寧對統計原始資料的研究，曾花費了很多非凡的勞力。列寧並沒僅僅止於簡單的觀察；他對他所利用的那些資料，都從根本上加以再度整理，並且，他往往又不得不把這些資料加以從新計算，而且列寧還是非常綿密而慎重地進行了這項工作。

列寧會無數次地和一貫地指示並解釋了計算（譯註：本譯文中的「計算」是由俄文yчeт翻譯的，但這樣譯法可能比較含混，一般經濟文獻中所使用的yчeт的含意是指：「經濟中的各種過程和人口學上的各種過程的計算、數字的反映」（蘇聯小百科辭典）。更確切地說：它是指着「國民經濟計算」而說的，其中包括統計計算（或簡稱統計）、會計計算、業務計算。以下同。請讀者注意。）和監督對於蘇維埃國民經濟建設所具有的意義，以及對於建造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所具有的意義。

---

註6：『列寧全集』，第1卷，第3頁。

註7：1934年6月25日『真理報』。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九月所寫的『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曾指出過：『計算和監督，——這是爲了把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安排好並使它能正確發揮作用所必需的主要條件』（註8）。

列寧認爲全民計算和全民監督是正當發揮社會主義經濟作用的主要條件，同時他又不止一次地指出了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困難就在於對這種計算和監督的保證。

蘇維埃政權建立後，列寧在其許多演說和論文中，曾三番五次地提出過保證計算工作和監督工作的任務。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席上，曾指出過：『不應該把任何一件製品、任何一斤糧食，置之於計算之外，因爲社會主義，首先就是計算』（註9）。

同日，列寧在彼得堡蘇維埃會議上所發表的演說，又指出了：『社會主義就是計算』（註10）。

一九一八年春，即開始從『剝奪剝奪者』過渡向有組織的鞏固既得勝利的時候，列寧曾提出了應把保證計算工作和保證監督工作的任務作爲當前的主要任務。

無產階級的計算與監督，在困難關頭時已成了自己的階級利器，用它去反對那些特別危險的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反對一切蘇維埃建設的敵人，反對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份子以及反對公然和他們站在一線上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們』的破壞工作。

列寧指出過，計算和監督是『社會主義的真正和主要的門徑』（註11），是『社會主義改造的核心』（註12）。列寧更着重指出過『社會主義的鎖鑰與基礎』（註13）就在計算與監督之中。

---

註8：『列寧全集』，第21卷，第440頁。

註9：『列寧全集』，第22卷，第45頁。

註10：『列寧全集』，第22卷，第50頁。

註11：『列寧全集』，第22卷，第163頁。

註12：同書，第490頁。

註13：同書，第441頁。

列寧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到四月所著『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書中，曾詳細地闡述了全民計算與全民監督的意義。

無產階級和它所領導的貧苦農民必須完成它們在建立新生產關係方面之積極性的與創造性的工作。『經濟方面存在着的主要困難就是：在生產物的生產與分配上實現最精密的和全面的計算與監督，提高勞動生產率，實際上使生產社會化』（註14）。

組織國家的蘇維埃統計（一九一八年七月）在各種強化國民經濟計算與監督的措施中，是具有巨大意義的。

蘇維埃共和國是新統計學、計劃經濟統計學的搖籃，而列寧與斯大林則是這種統計學的創始者。

列寧是蘇維埃國家統計的直接組織者。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列寧簽署了第一個『關於國家統計的決定』，在這個決定中，列寧關於在蘇維埃國家裡應設有中央統計機關的理想已得到了具體的實現。

衆所週知，列寧會經常關懷着國家統計的發展與加強，並經常給予援助，而且對於蘇維埃統計學家們又提出了高度的要求，要求他們成爲不是煩瑣哲學的，而是管理國家的實際助手，使中央統計局成爲不是『學院式的』機關，而是當前經濟分析的工具。

一九一八年末，列寧在其『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書中寫道：『蘇維埃共和國已創建了統計機關，並吸收了一切俄羅斯最好的統計力量，當然，不用說，急待獲得理想的統計是不可能的』（註14）。

一九二〇年八月，曾結合着農業調查和工業簡要計算而進行了第一次蘇維埃人口調查。這些調查是在列寧的領導和緊密幫助下進行的。

列寧關於當時的調查工作曾發出了許多指示電文，從這些電文中可以看出，列寧對於這些調查工作如何重視。列寧在一九二〇年五月發給各地省委、莫斯科和彼得堡市委、各省革命委員會以及西

---

註14：『列寧全集』，第23卷 第404——405頁。



伯利亞革命委員會的電文中寫道：『對於蘇維埃共和國社會主義建設來說，調查資料將具有頭等的和指導性的意義……對於建設蘇維埃共和國具有頭等意義的當前調查工作不以全力協助的過失者，不論其崗位如何，均應立即訴之於革命法庭』（註15）。

在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第三百七十九號電報中指出，『調查工作，並不是某一機關的工作，而是全共和國的工作，是蘇維埃所有機關的工作』。在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二日第四百六十六號電報中，曾指出：『我再以第二百四十九號、三百七十九號和四百一十六號電報命令你們，並希望採取一切辦法加強調查工作，無論是人口職業調查，抑或是考慮到工業企業的農業調查。調查工作對工農政府來說是迫切需要的。因為調查資料將成為蘇維埃建設的基礎。請你們作好使一切調查工作遍及全省的工作。請你們以革命的部署掃除已經遭遇到的一切障礙。請你們為有計劃地進行調查工作創設條件。請你們保證省統計局所需用的工作人員、房屋、食糧和金錢。請你們建立起相互間的聯繫。省蘇維埃的一切機關與組織必須對省統計局及其代表給予積極的援助。請你們與省統計局根據中央統計局的指示，製訂一個為順利整理調查材料而創造條件的計劃。龐大的有全國重要性的事業一天也不應停滯。因而你省必得按期調查完竣。我請你們注意，工農政府是需要你們集中全力來進行這一工作的。請你們嚴懲一切妨碍調查工作的人們，並請你們記住，工農政府首先對於如有不盡全力進行調查工作和不好好進行工作的情形，將向你們追究責任。請你們經由中央統計局，根據第三百七十九號電報把工作進程報告給我。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註16）。

在蘇維埃統計史上，一九二〇年是統計調查年，這一年的統計調查工作，是在列寧的領導和緊密幫助下作為一種全國性的和全民的事業，在最困難的條件中進行的。一九二〇年的調查，後來便成了

註15：『列寧全集』，第34卷，第296——297頁。

註16：『伊爾庫茨克省統計局資料』，第9分冊，第5頁，1922年版。

編製國家計劃時所必需的東西了。

在向新經濟政策過渡的時期中，由列寧詳細擬定的『勞動國防會議給地方蘇維埃政權的訓令』，對蘇維埃統計來說，具有頭等的綱領性的意義。

勞動國防會議給地方蘇維埃政權的訓令草案和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地方經濟會議、會議報告以及關於遵照勞動國防會議訓令進行工作的決定』草案等都是列寧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寫成的。

這個訓令一面規定了蘇維埃共和國的頭等任務，同時並根據經濟統計應適合於恢復國民經濟和平工作過渡期的任務這一原則，而規定了詳密的經濟統計綱領。

• 尙在一九一八年，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中，列寧就已指出了蘇維埃統計的根本特點，他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統計學乃是『官方人員』或少數專家們的特殊研究對象，但是，我們却應當把它貫徹到群眾中去，把它通俗化……』（註17）。

在這個訓令中，列寧重新談到這個問題時寫道：『真正的計算經驗，真正的交換經驗，吸收一切非黨優秀的和有才能的組織者，所有這些，如果沒有正確地編印出來的報告表（縱使份數極少）是不可能的。關於這一點，是能夠而且必須立即完成的』（註18）。

根據列寧的意見，統計應當是吸收群眾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有效辦法。

由列寧所提出的地方經濟會議報告大綱，是由可以合併為四項問題的二十八條構成的，其中包括着全國經濟生活的各方面；該大綱對於當時最被重視的問題給予了最大的注意（與農民進行商品交換、國家對資本家的態度、獎勵在商品交換中和全般經濟建設事業中的主動倡導事宜等等）。

列寧堅決要求，除提出一般報告資料外，還要指出具體事例和

---

註17：『列寧全集』，第22卷，第456頁。

註18：同書，第26卷，第368頁。

記述各別企業的典型情況或順利工作情況。例如在集體農場方面，他要求把它們按上等、中等、劣等加以區別，並指出應從三組中各選一個典型農場，每年不得少於兩次，詳加報告。

列寧在擬訂指令期間（一九二一年五月）在寫給克爾日扎諾夫斯基的信中，也包括着列寧對統計工作的指示，這些指示都具有原則上的和綱領上的重要性。列寧曾給國家計劃委員會提出了兩項任務，即：

1、通過統計分科委員會編製其特種指數，按經濟生活編製主要資料的每月綜合報告。

2、中央統計局應成立進行經常分析工作的機構，但是，這種機構不應是『學究式的』。『統計必須是我們的實踐助手，而不是煩瑣哲學似的東西』（註19）。

列寧即使在其生活與事業的末期，也未曾中斷過對統計的關心。列寧在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寫道：『據我個人的意見，對莫斯科市的所有工作幹部與一般工作人員，在同一天內進行一次調查，是絕對必要的。我們雖然已經有過一次調查，但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爲了以最少開支進行這工作（僅就紙張來說，就可能佔去中央統計局總儲存量的一部份），應該使一切從蘇維埃政權和托萊斯領取薪俸的人員把自己的資料寫在自己的調查表上（按中央統計局會同國家計劃委員會及工農監察機關應在一週內製訂妥善的簡要綱領進行），如果誰要寫得不清楚就不付給誰薪俸。同時應很快地把它收集起來（對遲交者和不好好執行的人處以罰金）。我們的機關是那樣死氣沉沉，以致應該加以澈底的整頓。現在，調查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中央統計局却是存在着值得斥責的學院主義：他們穩坐成套地寫書，但關於現實緊要的事情却置之度外』（註20）。

一九二二年十月曾進行了調查工作。一九二三年一月列寧曾令

註19：『列寧全集』，第20卷，第382頁。

註20：『列寧文集』，第35卷，第352頁。



人執筆而撰述了自己最後幾篇論文中的一篇『幾頁日記』。在這篇論文中列寧曾指出，最近出版的關於俄國居民文化程度（根據一九二〇年的調查資料）的著作，是一個重要事件。列寧在『幾頁日記』中曾引用了關於一八九七年和一九二〇年居民文化程度的總結表。這是列寧著作中引用的最後一個統計表。列寧給這個表作了中肯的結論，並發表了他的有名的指示：『我們的人民教師應處在那樣高的地位上，即提高到他們在資產階級社會中過去和現在都沒達到過，而且在將來也不可能達到的那種地位上』（註21）。

×

×

×

馬列主義根本改造了統計學。蘇維埃社會經濟統計學的力量源泉，就在於它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與政治經濟學為基礎的，也就是說它是以真正的科學為基礎的。蘇維埃社會經濟統計學的力量源泉，在於它是一種有階級性與黨性的科學。蘇維埃社會經濟統計學是一種有力的認識武器，有力的認識方法。在列寧的最早的著作『農民生活中的新經濟動態』中已經包含着決定統計學與經濟科學之間的相互關係的指示。經濟學是依靠統計學，把它當作認識武器，利用統計資料而說明各種經濟過程的。列寧指出過：『……沒有它們的充分而正確的說明，那麼，關於任何實際措施的指示都是無從談起的』（註22）。

什麼是統計的認識方法的特點呢？關於這個問題，列寧曾經作過詳細的闡述。列寧在其未完成的文稿『統計學與社會學』（一九一七年）中寫過：『一個事實，如果是從其整體中，從其相互聯繫中抽取出來的，那麼，它就不僅是『確鑿的』，而且無條件是真實的東西』。『爲了使它成爲一個真實的基礎，就應當不去抽取個別事實，而是必須毫無例外地去抽取包括一切與被觀察的問題有關聯的事實的整個總體……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決定由統計學着手作』

註21：『列寧全集』，第27卷，第389頁。

註22：『列寧全集』，第1卷，第49頁。

起……』（註23）。

由此可見，科學的統計，是從事實的總體及其相互聯系中抽取事實的。這是它的基本認識原則。在『論地方自治機關統計任務問題』一文中，列寧關於整理統計資料的各項任務，作出了深刻的、決定性的指示。這些指示對於蘇維埃統計學來說，是具有充分意義的。列寧寫過：對那些在其蒐集與檢查的詳細性與綿密性上非常卓越的大量地方自治機關統計資料，必須加以適當的整理。對於統計資料應該根據下述方針整理，即：使我們可以得出一種以大量資料的計算為基礎的、正確的、客觀的回答，使得出的結果能夠回答由經濟分析所指出和揭露的各項問題。應該這樣來整理統計資料，即：使我們可以根據它來在所調查的現象的各方面和各種形態上進行全面的研究。列寧特別強調了在調查曾經存在過的或在現實中存在着的各種經濟類型中統計的任務。在調查工作中，先進的經濟理論具有指導的作用。

但與此同時，統計在經濟研究中的任務却是創造的與積極的，它的任務決不是僅僅止於『測度』已知的規律。

被經濟理論所領導的統計，要把已記錄的事實加以分組。統計調查結果的分組基礎問題，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的、列寧——斯大林的統計據以分組的基礎，就是能夠藉以區分和藉以個別地觀察各種經濟現象的那些本質上的標識，就是能夠藉以推進社會認識、能夠恰如其份地反映真象的那些本質上的標識。資產階級據以分組的基礎，則是一些掩飾不可調和的階級對立現象的標識。資產階級統計學的目的在於替資本主義作辯解，它並不以、而且也不可能以從事真正的科學研究為己任。在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中，對於統計分組的本質、原則與方法，都有極深刻極週詳的說明。列寧當攻擊民粹主義，揭露其反動本質時，曾不止一次地批判了

---

註23：『列寧文集』，第30卷，第303頁——304頁。

民粹主義陣營中的地方自治機關統計員們所採用的反科學的分組法。列寧曾不止一次地批判了資本主義各國、尤其是美國所採用的統計分組法。列寧已指出了哪些東西是真正科學的分組基礎，並認為資產階級由於受它的階級狹隘性的限制是不可能利用這種基礎的。

列寧在其所著『農民生活中的新經濟動態』一文中就已提出。論證並已使用了農民經濟的分組法，這種分組法是按照農民經濟社會經濟類型的標識來進行的。列寧寫道：『我們既然承認了現代農民中有很深刻的經濟差別，所以就不能僅僅止於按照財產的多寡把農民劃分為若干階層。如果認為上述種種差別，歸終不外是數量上的不同，那麼這種把農民劃分為若干階層的辦法已經是很好了。但是，事實並不如此。如果一部份農民經營農業的目的是追求商業利益，結果是獲得巨額貨幣收入，而另一部份農民經營農業的結果，甚而不够全家的必要消費，如果上層農民改善經濟，是以下層農民的破產為基礎，如果富裕農民大部份是利用僱傭勞動，而貧苦農民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那麼所有這一切情形，毫無疑問都是質量上的差別，所以，我們的任務應該是按照農民經濟性質本身的不同來對農民加以分組（自然，這裡所說的經濟性質並不是技術特點，而是經濟特點）』（註34）。

列寧關於統計材料分組的種種詳細指示，具有永恒的一般的科學意義，對於蘇維埃統計來說仍然保有着它的基本的領導意義。

蘇維埃經濟具有多種多樣的具體生動內容，而且都是可以廣泛利用統計分組法加以研究的。這也是我們的重要任務之一。在科學的統計學中，與分組法有密切關係的是平均數法。這種方法的原則，也可以在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中找到深刻的多方面的說明。我們對於這兩種科學的統計方法，應該在兩者的統一中去瞭解。分組法是平均數法的基礎，是它的根本。當我們計算平均的一般化的各種

註34：『列寧全集』，第1卷，第7頁。



指標（沒有這種指標，科學的統計工作就行不通）時，應該以同類的種種現象為根據。統計的平均數在認識上的意義就在於它能反映出我們所研究的社會經濟現象的典型特點。但是，要使平均數具有這種屬性，平均數的計算就要以合理的有科學根據的分組法為依據。列寧和斯大林警誡我們，不可用籠統空洞的未經過修正的平均數，因為資產階級的統計也正是濫用着這種平均數，以達其同一的目的，即替資本主義作辯護。列寧在其主要論文『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寫道：『……一般而籠統的「平均數」完全是空洞的』（註35）。

列寧和斯大林在他們的著作中，當解釋作為認識工具的平均數法的局限性時，指出有用足以標誌出新的先進情況的具體實例，對平均數加以補足的必要性。列寧斷然要求統計人員要指出個別實例：『凡是與經濟建設有關的，稱得起模範、優秀或工作順利的企業，部門和機關，都必須個別指示出來（如果既沒有模範單位，又沒有優秀單位，就必須指出工作順利的單位）……比較無希望的和無效果的企業，也必須指示出來』（註36）。

從斯大林關於平均先進定額的指示看來，從國民經濟計劃以先進經驗、以優秀模範、以平均先進定額為依靠這個重要事實看來，用統計方法表示國民經濟中的先進的進步的情況，是有巨大意義的。先進的進步的現象所以成為蘇維埃統計的注意中心，是因為蘇維埃統計乃是管理國家和計劃國民經濟的主動的、戰鬪的、創造的、有效的武器。

在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中，對於蘇維埃統計這種社會主義建設的武器所具有的意義與任務，曾從各方面加以詳細說明。曾指出中央統計局所犯的錯誤，曾揭露了這些錯誤的根源，並指出了克服這些錯誤的途徑與改善統計工作的途徑。蘇維埃統計，是整個社會主

註35：『列寧全集』，第3卷，第105頁。

註36：『列寧全集』，第26卷，第376頁。

義計算制度中的最重要的主導部份，政府指定由中央統計局領導社會主義的計算事宜。

以蘇維埃社會經濟統計工作為重要主導部門的社會主義計算制度，它的創造者就是列寧和斯大林。列寧和斯大林的有決定性意義的指示，已決定了社會主義計算的任務、內容和組織形式。當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五日召開第一次全俄工農監察機關負責人員會議時，斯大林同志曾於開幕詞中特別着重指出過：整頓中央和地方的計算和報告工作這一任務是具有頭等重要意義的。

斯大林同志指出：『要點就在於監察機關的工作人員要在檢查工作結果中或進程中，幫助我們的中央和地方的政權工作同志，幫助他們確定最適當的國家財富計算形式，幫助他們確定最適當的報告表格，幫助他們整頓供應機關、平時和戰時機關、經濟機關』（註37）。

盡人皆知，斯大林同志關於計算與統計的關係的指示，是『計算離開統計，就寸步難行』（註38）。

包保夫（中央統計局第一任局長）在他所著『國家統計與列寧』（註39）一文中，曾對列寧在一九一八年成立國家蘇維埃統計局時給他的各項原則性指示，加以詳細解釋。

列寧指出過：包保夫在他自己的工作中很清楚地知道，農村統計局的統計工作較過去是有成績的（包著前書第五頁）。

列寧毅然指出，國家統計局應該努力的方針，是對整個國民經濟作有步驟的研究（包著前書第六頁）。

列寧也指出過：由於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他相信統計也和其他科學部門一樣，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都是為了一定的階級利益；他希望看到國家統計局成為一個為無產階級利益和革命利益而工作的

---

註37：『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366頁。

註38：『蘇俄共產黨，（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速記報告』第130頁。

註39：1929年統計通訊第1至3期。

機關（包著前書第六頁）。

蘇維埃的計算工作和統計工作，已經歷了三十多年的發展途程。計算和統計制度，已經形成了，而且日益鞏固起來。但是，社會主義的計算工作究竟有些什麼基本特點呢？

在社會主義國家裡，計算像和它有密切聯系的計劃一樣，乃是千百萬勞動者的生動而實際的活動，其活動的目的，是建設共產主義社會，是保障神聖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是調查可以完成和超過完成國民經濟計劃的補充資源與後備力量，是加強社會勞動紀律。

在蘇聯，計算是國家的事業，同時也是全體人民的事業。這就是說，蘇聯在國民經濟方面，應該有最嚴格的國家紀律。在蘇聯完全佔統治的是生產手段的社會（社會主義）所有制，在蘇聯，社會財富是人民的財產，在蘇聯，每個勞動者都關心自己的勞動成果，因此，在蘇聯的計算就成了全體勞動者的切身事業。

蘇聯實行着統一的國民經濟計算制度。這種蘇維埃國家計算制度的特點，曾在斯大林憲法（第十四條）中，經立法程序所確定。

蘇聯的計劃工作是依靠着包羅萬象的計算制度的。計算給各種國民經濟計劃的編訂工作提供材料，同時計算也是監督各企業各部門各區域和整個國民經濟部門執行計劃任務的工具。

計劃對於計算說來，乃是主導的組織的原則；社會主義計算，是有計劃有組織的計算。

在蘇聯，計算是蘇維埃的、真正人民國家的工具，是建設共產主義的工具。因此就應該對計算提出最重要的要求，要求它達到嚴格的精確性與真實性。斯大林同志在共對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中，談到機會主義份子、即後來被暴露的人民公敵們企圖歪曲統計資料時曾指出：『我們認為中央統計局應該得出客觀的資料，不為任何偏見所左右的資料，因為企圖追逐適合某種偏見的數字，這是刑事性的罪犯』（註40）。

---

註40：『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29——至330頁。



列寧認為，到處進行的種類繁多的嚴格的計算和監督，應該成為全國範圍內促進勞動生產率之提高的手段之一。計算應該成為有助於擴展社會主義競賽的手段，成為表示先進經驗最好的典型的手段。此外，計算還應該揭發劣等工作的事實。

社會主義計算的任務，是保障神聖的社會主義財產。斯大林同志在其有歷史意義的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當分析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時曾指出，在我國發展的第二階段上，國內實行武力鎮壓的職能已經消滅了，已經出現了『為防範那些偷竊侵吞人民財富者而保護社會主義公產的職能』（註41）。

要執行這種職能，就要有嚴格的物資計算和貨幣計算。

計算是實行經濟核算制的手段。社會主義各企業的活動，是建築在經濟核算制和設法節約物質資料與貨幣資金等原則上的。為減低成本，動員內部資源，合理利用銀行信貸而鬭爭，這應該是各企業各機關進行經濟工作的基礎。

斯大林同志曾屢次指出計算對領導經濟和實行經濟核算制的意義。

社會主義計算——蘇維埃統計——的目的，是從各方面研究國民經濟，分析國民經濟的發展法則。擺在社會主義計算面前的任務，是正確地反映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歷史競賽過程，是正確地反映蘇聯在這一鬭爭中的種種成就。

列寧和斯大林的學說，在對腐朽的、極其唯心與反動的資產階級偽科學作鬭爭的過程中，把蘇維埃統計工作者武裝了起來。列寧和斯大林的學說，要求蘇維埃統計工作者，對滲透於個別蘇維埃著者的作品中的資產階級影響，進行不妥協的鬭爭。馬列主義是我們的鬭爭武器，我們要用這個武器去反對形式主義和煩瑣哲學，去反對腐朽的世界主義，去反對在資產階級偽科學面前低首下心媚態百出的現象，去反對企圖在理論方面破壞蘇維埃統計的狡黠的經驗論

---

註41：『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11版，中譯本，第792頁。

和虛無主義。

蘇維埃統計創造了包括全部國民經濟在內的指標制度。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都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一種統計，能夠和蘇維埃的社會經濟統計相提並論。蘇維埃統計所進行的驚人的調查工作，也是無與倫比的。曾獲得政府極高評價的、一九三九年所進行的人口調查，從理論方面說，是人口學的最大成就。但是我們決不應該由於這些以及另外一些無可置辯的成就，便對下述事實視若無睹，即在蘇維埃統計實踐中尚存在着許多有待迅速剷除的極嚴重的缺點和漏洞。

例如，物資供應統計和技術經濟定額統計，做的都不合要求。這兩種經濟統計部門的重要性，是不待詳加說明的。新技術的國家統計和自然資源統計，尚處於不健全的狀態中。各部和各機關對於統計的領導，以及對統計報告之精確性的檢查，做的都不恰當。計算機械化與更完善的計算機器的採用，實施的都嫌不夠。國家統計機關和各機關所收集的統計材料，大部分還未能適當地加以研究與分析，在許多問題上，統計理論尚不能滿足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需要。

蘇維埃統計人員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深刻地全面地研究馬列主義，研究列寧和斯大林關於計算和統計的指示，並以此為基礎來研究社會主義計算與統計的理論，以此為基礎來改進計算和統計的實際工作。

（陳東旭、戴有振合譯自蘇聯中央統計局機關雜誌『統計通報』，一九四九年，第一號）

## 斯大林與統計

蘇聯的統計，是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的一九一八年，由列寧直接建立起來的。列寧不僅奠定了蘇聯統計的組織基礎，他對統計學理論發展的影響，尤為巨大，這無條件地必須在統計學的發展史上劃分出列寧時代。

列寧的偉大學生——斯大林同志，繼之加強和改進了國家統計機構，並且深入鑽研了這門科學。

列寧曾經說過：『社會經濟統計學，乃是認識社會的強有力工具之一』（註1）。統計方法的力量，就在於它是辯證法的形式之一。當列寧所研究的事實，不是單獨的，而是被觀察現象中的事實的總體時，他都是認為必須從統計開始作起。（註2）

統計學從事物和現象的總體中及其共存狀態中，研究事物和現象。統計學有兩個基本的起碼的概念，這就是總體和共存狀態中的對象及現象。統計學把某一對象總體所具有的標識變動，視為運動形式之一，視為共存過程所特有的運動形式。列寧認為，『從共存過渡到因果律，從一種聯系形式和相互關係形式過渡到另一種更深入的、更全面的形式』（註3）是辯證法的一個要素。辯證法的這一要素就是統計學的基礎，是它的出發點之一。

在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於研究經濟生活的過程時，廣泛地利用着統計資料，斯大林同志熟諳辯證法，他的影響當然也要表現在

---

註1：『列寧選集』第10卷，368頁。

註2：『列寧選集』第30卷304頁，『統計學與社會學』一章。

註3：同上 1939年版第9卷277頁。



作爲辯證法形式之一的統計方法的各種基本問題上。

×

×

×

列寧對於計算與監督在共產主義社會建設事業中所起的作用，曾賦予了巨大的意義，這是盡人皆知的。列寧寫道：『計算和監督就是爲了把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安排好，使它能正確發揮作用所必需的主要條件。』（註4）。

原始計算、業務計算、會計計算和統計計算等在蘇維埃經濟中獲得了巨大發展。無論是任何一個集體農莊、工廠或企業，如無正確的和有組織的計算工作，便不可能存在和發展。在蘇聯，統計和計算的體系內，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那些以原始記錄和表報制爲基礎的統計觀察。

過去在革命前俄國的統計中曾具有很大意義的通訊調查法，在我們的條件下幾乎不應用了。蘇聯經濟生活的調查和研究，基本上是以合理的經常性原始記錄和表報制爲基礎的。全國的企業機關，必須按照規定的項目在指定的期限內，根據經常性原始記錄，編製表報提交國家中央計算機關和統計機關。

現在，蘇維埃國民經濟計算制度，業已建立完備。蘇聯憲法第十四條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由其最高國家政權機關及國家管理機關行使下列之職權：

第十九款 組織統一的國民經濟計算制度』。

在組織統計和計算工作方面，發生了很大變化。其最終結果，便是統一的國民經濟計算制度被建立起來。

斯大林同志在俄共（布）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曾說過：『…任何建設工作、國家工作、計劃工作，若是沒有正確的計算，是不可想像的。但是計算如果沒有統計，也是不可想像的。計算如果沒有統計，則一步也不能前進的』（註5）。

註4：『列寧全集』，第21卷449頁。

註5：俄共（布）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速記報告，『紅色處女地』出版局1924年版，130頁。

斯大林同志的這個思想，對於建立國民經濟計算（具有統計形式的計算）的理論基礎來說，影響是很大的。在這幾句話裡，特別指出了統計在計算方面的積極的組織作用。統計與計算，並不單純是統一的社會主義計算的『兩方面』。在這裡，統計是有着領導作用和主導作用的。統計並不是社會主義計算的消極工具，它是整個國民經濟計算體系中最積極最有力的工具。統計之所以會有主導的組織作用，就在於統計學能對整個社會主義計算體系指出明確方向。

統計不僅是在整理和分析所蒐集的計算資料時能發揮作用，並且當對一國國民經濟中所發生的過程，組織初步觀察時，它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統計是編製概括指標的方法，所以它的決定性作用也表現在組織計算上：選擇計算項目、確定其內容、確定觀察單位、規定登記期限和報表期限、以及選定彙總和整理計算資料的方法等。無論是原始計算表格，或經常性原始記錄表格，或報告表，它們如果不經過統計分析，換句話說，不用那些對國民經濟中所發生的過程具有監督力量的概括指標加以分析，它們的編製便不可能正確。祇有在具有統計形式的計算體系下，才可能比較與對照計劃和計算的概括指標，沒有統計形式的計算，就不能夠保證資料的可靠、真實和正確性。

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於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頒佈的『關於畜產統計及真理報上的討論』的決定中指出一九三四年牲畜計算體系中的缺點：『現行的牲畜計算體系，不能提出有關現有牲畜頭數的可靠數字。這就是因為：（甲）牲畜頭數的計算不是以統計形式組織起來的，這個計算只不過是把各機關的業務計算資料，無充分根據的加以修改後做出來的罷了』（註6）。

從斯大林的統計形式的計算理論的觀點看來，說統計將發展為

---

註 6：見『真理報』，1934年5月17日 No. 134。

計算的這種荒謬『理論』，顯見是十分有害的。這個『理論』硬說：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對計算資料加以統計的整理，是不必要的，代之以單純計算就可以了，而不必用體現在統計學中的人類思想上的成就，來充實計算的實踐；應該解除蘇維埃的國民經濟計算體系的武裝，廢除這個體系中的概括指標的統計法，即廢除這個『認識社會的有力工具』。但是，斯大林同志對於計算與統計相互關係問題所作的詳細明確的言論，結束了一切在這個問題上的理論動搖。因此說，斯大林同志對於統計學樹立了很大功勳。

×

×

×

列寧在其有關經濟問題的各種著作中，廣泛地應用了平均數法。列寧在這些著作裡對於民粹派的『濫用平均數』，給予了深刻的批評。列寧在其古典著作『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中，曾經寫道：『…一般而籠統的「平均數」，完全是空洞的』（註7）。列寧教導說，當分析農民階級分化時，必須求出各個農民集團的平均數來。利用平均數法的唯一正確態度，就是採取組平均數，而不是採取一般的籠統的平均數。

列寧所以重視統計的概括方法，是因為這種方法可以使某一事物的龐雜現象，也就說可以使包括在觀察之中的標識浮現於外。

列寧把地方自治機關的統計工作，稱為是『令人惋惜的事實』，因為這裡面雖然有很多的資料，『都是些未經合計、未經彙總、未經分組和複合』（註8）。

統計觀察（不論是有統計形式的經常計算也好，或是一次統計觀察，如普查也好），將所研究的現象的重要標識，加以記錄。統計在整理所蒐集的資料時，是以辯證法為根據的，任何現象，如果把它孤立起來看，那它就是不可瞭解的東西。斯大林同志指示說：『…

---

註 7：『列寧全集』，第3卷，105頁。

註 8：同上 第17卷，180頁。



任何一種現象，如果把它看作是與週圍現象密切聯系而不可分離的現象，把它看作是受週圍現象所制約的現象，那它就可以瞭解，就是有據可考的東西』（註9）。

而一般的籠統的平均數，恰恰就是把這一個現象和那一個現象，把這一個標識和那一個標識孤立起來觀察，而不和其他的現象和標識聯系起來觀察。當計算一個一般平均數時，決定該現象的各種條件，並不加以區分。至於計算組平均數時，即進行資料的分組和綜合時，所研究的現象則不是孤立地被觀察，而是與其他主要因素相互聯系起來加以觀察的。

求組平均數時，決定該現象的某一條件或若干條件，是被區分開來，被揭明真象；用平均數法，才可能確定出現象之間或標識之間的聯系。

斯大林同志深刻地研究了並發展了列寧的關於平均數法的學說。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九年四月聯共（布）黨中央全會上，揭穿李可夫的農業退化的荒謬論斷時，曾說道：『…凡是不以地區別的統計材料加以修正的平均數法，不可算作科學的方法』（註10）。

繼之，斯大林同志便以播種面積動態為例指出說，祇有以科學態度處理問題，才可能發現播種面積動態的前後一貫的趨勢。斯大林同志說：『自命為馬克思主義的人們，看見富農局部縮減播種面積，就大驚小怪起來，認為這是播種面積一般的縮減了，而忘記了除富農之外，還有貧農和中農，他們的播種面積正在擴大着，還有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它們的播種面積在加速增長着。』（註11）。

斯大林同志在他這篇演說中，在以下兩方面深化了列寧的平均數法的學說：

（1）斯大林同志給科學地應用平均數法與非科學地應用平均

註9：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11版，516頁。

註10：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11版，256頁。

註11：同上，257頁。

數法之間，劃出截然不同的境界；

(2) 斯大林同志認為材料的「修正」方法，換言之，就是不孤立地去觀察材料，而是和其他現象聯繫起來，通過組平均數，或『修正的』平均數來觀察材料，才是科學的平均數法最基本的因素。

斯大林同志爲了修正關於播種面積動態的平均數，將區域標識作爲分組用的標識，在研究播種面積動態的時候，採用這個標識，是理所當然的事。但緊接着，斯大林同志又從社會結構上，從氣候條件方面，分析了播種面積的變動，這一點表示區域標識的選擇，是屬於個別情況的。至於斯大林同志所說的『凡是不以地區別的統計材料所修正的平均數法，便不可能算作科學的方法』這一原理本身，是有更全面的意義的。這一原理，在建立蘇維埃的修正平均數理論的基礎方面，起了很大的影響。

用某些標識『修正』另些標識的辦法，可以使現象的典型特徵顯露出來，從而也就可以確定出所研究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最經常出現的特徵。

應用修正平均數的理論，能够把統計學上的兩種基本方法——平均數法和分組法，綜合成一個統一完整的東西。

×

×

×

蘇聯這隻巨船的偉大舵手斯大林同志，深切關懷着研究工業動態、農業動態，以及整個國民經濟動態的各種方法的科學性。對於研究動態的方法問題，亦即對於處置各時期經濟變動的問題，斯大林同志在他的著作裡，曾不惜闢出巨頁來加以論述。在這些著作裏，斯大林同志運用了一系列測量動態的指標：如水平、絕對增長額、速度、增加百分之一所具有的意義以及經濟方面的水平等。

斯大林同志最重視速度這一測量動態的指標。然而，同時他也強調其他測量動態的指標的重要性。斯大林同志在他的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中說道：『不要把工業發展速度和工

業發展水平，彼此混淆起來。有許多人把它們混爲一談，認爲我們工業的發展若是達到了空前的速度，那我們就是達到了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發展的水平。這基本上是錯誤的』（註12）。斯大林同志接着就引舉電力和生鐵等的生產爲例，加以說明。

斯大林同志在其總結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報告中，重新談到了這個問題：

『最後，還要簡略談談我們的速度和每年產量增長百分率所包括的內容問題。我們的工業工作人員是很少研究這個問題的。而這却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什麼是產量增長的百分數呢，每增長百分之一，其所包含的內容怎樣呢？』（註13）。

斯大林同志繼而分析了一些數字，現在我們把這些數字列成下表：

年 度	工業生產總值 (單位：百萬盧布) (水 平)	每年增長絕對 數字 (單位： 百萬盧布) (絕對的增長)	每年產量增 長百分數 (速 度)	每增長百分 之一的價值 (單位：百 萬盧布)
1925年……	7700	3030 (以上)	69	45
1928年……	15500	3280	26	126
1931年……	30800	5800 (以上)	22	250(以上)

『所有這些是說明什麼呢？——斯大林同志問道，——就是說明，在研究產量增長速度時，決不可僅以考察增長額的總百分數爲限，——而是還要知道增長額的每百分之一所包含的內容和全年產量增長的總額』（註14）。

一九二五年增長額的每百分之一等於四千五百萬盧布，全年產

註12：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10版，367頁。

註13：同 上，第11版，378~379頁。

註14：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11版，379頁。



量的增長總額，即絕對增長額，爲三十餘億盧布。一九二八年前者（每百分之一）爲一億二千六百萬盧布，後者（全年增長總額）爲三十二億八千萬盧布；一九三一年——前者爲二億五千萬盧布以上，後者爲五十六億盧布以上；到一九三三年時，百分之一的價值，就已經等於三億二千萬乃至三億四千萬盧布了。

斯大林同志最後總結說道：『同志們，如果具體考察增長額速度和百分數的問題，那末情形就是如此』（註15）。

六年後，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裡，又重新談起關於研究動態的問題，使測量工業發展水平的方法更加精確化。他說：『在考察一國工業的經濟實力時，不要單看一般工業產量，不顧及國內人口多少，而是要注意到工業產量與國內每人消費額間的對比情形』（註16）。

的確，就工業生產技術和增長速度來說，我們已經追上並且追過了各資本主義國家。『可是我們究竟在那一方而還落後呢？』斯大林同志問道，並答覆說：『我們是在經濟方面，即在我國工業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生產額方面仍然落後』（註17）。從而，斯大林同志在這裡就提出了動態的補充指標——水平的經濟意義。

斯大林同志就這樣創建了一套完整的指標，豐富了動態數列統計加工（即用統計學的方法加以整理）的理論。有這些指標，就可以闡明經濟過程中的各種特點。

×                      ×                      ×

對於研究經濟現象的結構的問題，斯大林同志也非常關懷。因爲一般說來，某一經濟現象中的變動，對於經濟過程是有重大意義的。

---

註15：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11版，379頁。

註16：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11版，578頁。

註17：     同                      上                      ，577頁。

拿斯大林同志分析大戰前時期和一九二六至二七年時期糧食生產結構做例子，就足夠說明他對於結構的變動，如何關心。關於這個問題，斯大林同志在他的著作中，曾談過三次（『在糧食戰線上』，『論蘇聯土地政策問題』以及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的總結報告）。

斯大林同志在『在糧食戰線上』一文中，提出了一個特別清晰的分析表，說明了糧食生產的社會結構：

	糧食生產總量		商 品 糧 食 (運出農村以外的)		商 品 糧 食 所佔百分數
	單位百 萬普特	百分數	單位百萬 普 特	百分數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					
地 主 .....	600	12.0	281.6	21.6	47
富 農 .....	1,900	38.0	650.0	50.0	34
中農與貧農 .....	2,500	50.0	369.0	28.4	14.7
總 計 .....	5,000	100.0	1,300.6	100.0	23
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					
國營農場與					
集體農莊 .....	80.0	1.7	37.8	6.0	47.2
富 農 .....	617.0	13.0	126.0	20.0	20.0
中農與貧農 .....	4,052.0	85.3	463.2	74.0	11.2
總 計 .....	4,749.0	100.0	630.0	100.0	13.3

斯大林同志說道：『……這些數字足以使我們看明白，從一般糧食生產的結構上看來，特別是從商品糧食生產的結構上看來，戰前時期與十月革命以後時期是有很大差別的』（註18）。

『這個統計表是說明什麼呢？』斯大林同志問道，並答覆說：『第一，它說明絕大部分的糧食生產，已從地主、富農方面轉

註18：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11版，185～186頁。

到小農、中農方面。這就是說，小農和中農業已完全解脫了地主壓迫，在基本上打破了富農勢力，於是就得到了最切實改善自己物質狀況的可能。這就是十月革命的結果』（註19）。

第二，從糧食生產總量和商品糧食生產方面看來，它說明蘇聯到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前後，已變成小農經濟的國家。中農成了農業方面的『中心人物』。

第三，它說明『地主經濟（巨大經濟）已被消滅，富農經濟（巨大經濟）已縮減至三倍有餘，我國已由地主富農經濟過渡到只能輸出百分之十一的產物的小農經濟，同時，在糧食生產方面，又還沒有若何發展的巨大公共經濟（即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這些情形，本來應當而且果然已使商品糧食生產額比較戰前銳減了』（註20）。

一九二六至二七年間的糧荒的基本原因，是因為當時我們所有的商品糧食，比較戰前時期減少了一倍，雖然糧食生產總量和戰前一樣。

斯大林同志不但技巧地分析了上面舉出的統計表，並且從這個分析中作出了極有義意的革命性的結論。工人和農民的英明領袖斯大林同志指示說，我們的出路並不是在於發展和擴大富農經濟的反動『計劃』，而是在於『……首先，要把落後的散漫的細小農場聯合成為大規模的公共農場，這種公共農場必須是能得到機器供給，用科學成就武裝起來，而能够生產最多商品糧食的。我們的出路就是要在農業方面由個體的農民經濟過渡到集體的公共經濟』（註21）。

此外，斯大林同志發現我們的出路也還在於擴大並加強舊有的國營農場，組織並發展新的國營農場，以及有系統地提高農產收成率等等方面。這一天才的計劃，在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和斯大

註19：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11版，第186頁。

註20：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11版，186頁。

註21：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11版，188頁。



林同志的領導下，終於由農民群眾徹底實現了。

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同志在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的演說中，當闡述城鄉間關係問題、十月革命的成就問題以及正在成長中的集體農莊的動向的時候，再一次引用了上述數字。

十年後，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裡，當分析集體農莊及國營農場生產中商品糧食的水平時，又提到了這一問題。他說：十年的經驗證實了『……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生產中大量的商品糧食額，是它的最主要的特點，這對於國家的供應問題是有莫大意義的』（註22）。

斯大林同志指出集體農莊與國營農場生產中這一極為重要的特點的時候，還是在一九二八年，亦即在農民群眾開始走向全面集體化前夕的事情。

列寧曾教導經濟學家們必須『閱讀』和『分析』統計表。除此而外，任何一個研究統計學及統計理論的人，也不能忽視斯大林對於計算指標（標誌國家經濟生活變動的），所做政治、經濟與統計分析的輝煌範例。

×

×

×

蘇維埃經濟統計的中心問題，就是如何根據馬克思的再生產論，編製出一套有系統的蘇聯國民經濟平衡表。

斯大林同志對於這方面的各種工作，始終表示着極大的科學興趣。十年前，即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同志在其『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的演說中，總結了一下這方面的工作情況。他說：『中央統計局在一九二六年當作國民經濟平衡表所公佈的東西，並不是什麼平衡表，而是一種玩弄數字的遊戲。巴查羅夫和格羅曼對於國民經濟平衡表問題的解釋，也是不符合事實的』（註23）。

斯大林同志在他這次演說中，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們，提出

---

註22：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11版，583頁。

註23：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11版，294頁。

了一個任務——建立起馬克思式的國民經濟平衡表綱要，斯大林同志說，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他們想仔細研究過渡時期各經濟問題的話就必須製定出蘇聯國民經濟平衡表的綱要來』（註24）。

斯大林同志在那次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的演說，就是聯共（布）黨史中所說的歷史性變革的開端，聯共（布）黨史說道：『……這是一個極深刻的革命，是從社會的舊質態轉變到新質態的突變，照其結果來說，它是與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變革，具有同等意義的』（註25）。

爲甚麼斯大林同志在他這篇歷史性講演的結語中，要提出編製國民經濟平衡表的問題呢？

當時黨的政策，是在於改造國民經濟的農業基礎，是在於消滅巨大的社會主義工業與細小的農民經濟間的矛盾，而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一直就是建立在這兩個不同的基礎上的。斯大林同志說：『要是以不能擴大積累的小農經濟爲農業基礎，難道能夠作到加速推進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嗎……？當然是不能作到的』。斯大林同志繼而說：『我們的出路就在於擴大農業，使它能够實行積累，能够成爲進行擴大再生產的農業……』（註26）。

格羅曼以及巴查羅夫向中央統計局提出的國民經濟平衡表綱要，其出發點是一種有害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部門的平衡『理論』，並以這種平衡問題代替了列寧所提出的國民經濟比例問題。這些平衡表綱要，歪曲了馬克思的關於變動與平衡的辯證統一學說，歪曲了他關於變動的絕對性和平衡的相對性及條件性的學說。這些綱要，把問題顛倒過來了：把平衡說成了是絕對的，而將變動說成了相對的。

斯大林同志在他的演說裡，對這些平衡理論給予了致命的打擊，並提出了使小農經濟過渡到大規模公共農場的問題，因爲這種經

註24：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11版，294頁。

註25：『聯共（布）黨史』，291頁。

註26：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11版，277—278頁。

濟能够保證實行積累並擴大再生產。因此，斯大林同志在他演說的結尾中，對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尖銳地提出了關於編製國民經濟平衡表綱要的問題，號召他們研究出一套確能由數字反映出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的變動與比率的經濟統計表。

蘇聯的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們，自接受這個任務以來已經十年了。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院，在數年前便從事國民經濟平衡表問題的研究工作，現在，蘇聯國民經濟中央統計局仍在繼續着這個工作。但是，它們的工作成績直到現在也未見公佈，因此蘇聯輿論界也就無法判斷斯大林同志所給予的這項任務，究竟完成到如何程度。國民經濟平衡表是蘇維埃經濟條件下的馬克思再生產論在統計與經濟方面的具體表現，對此平衡表進行科學研究，雖在今天也如十年前一樣，是迫切需要的。

×

×

×

在反對浪費、動員經濟部門內部的積累源泉以及降低成本的鬭爭中，經常計算生產費用，是有重大意義的。斯大林同志在經濟工作人員會議上的演說裡指出了『……必須計算、核算並編製正確的收支平衡表』（註27）。

莫洛托夫同志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發展了斯大林同志的這個思想，他說：

『要實際去注意經濟，注意產品價值。必須很好地知道每個企業和每個機關的工作，要國家付出多少費用。然而我們現在還有一些經濟領導人員，認為看一看平衡表、研究一下表報和經濟核算制的問題，是不是掛齒的事。必須要像肅清反國家行為和反布爾什維克行為那樣，堅決地掃出這種漠不關心的態度和無經濟頭腦的作風。這樣，我們的許多浪費現象，才會自行消滅』（註28）。

註27：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11版，346頁。

註28：見『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第三次五年計劃』一書35—36頁，莫洛托夫在第十八次聯共（布）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和閉會辭。



我們對於生產費用的統計和成本計算工作，還不够重視。這就縱容了危害國家的不良份子，在這裡幹出骯髒的勾當。例如土地人民委員部的危害份子在一九三八年廢除了機器拖拉機站工作的成本計劃，和成本核算。這時，這些危害份子硬說，機器拖拉機站既然已改由國家預算撥款，那就似乎不需要什麼成本了。

不根據工作量計劃完成情況進行預算撥款的結果，造成了國家資金的浪費。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三日蘇聯人民委員會與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所頒佈的『關於機器拖拉機站的工作』的決定中，嚴格地斥責了並廢除了這種辦法。這項決定，特別規定出要對於拖拉機工作、打穀機工作以及康拜因機等工作的成本費，編製出必須履行的任務。

今天擺在統計學面前的巨大任務，就是要合理地建立起關於成本計算的經常表報制度。產品成本費的計算工作，必須是統計形式的。要通過這種表報，檢查產品成本是有了節約還是超過了計劃。並且應注意這些表報不要流於龐雜。

目前，各個企業每月的計算工作分量，雖然很繁重，但是却不能經常保證完成基本任務，即不能保證按實際完成的工作量，及時提出關於費用的實際額與計劃額不一致情形的資料。

斯大林同志與莫洛托夫同志，給國內各統計機關、各計算工作人員以及給統計學提出了如下的任務：

（1）建立起各企業與各經濟機構的，適合於統計要求的成本核算工作；

（2）研究『社會主義生產費用』這一概念的內容問題；

（3）使核算方法更加精確化（例如：各種產品一般費用和間接費用的劃分方法等）；

（4）研究與計算與成本有關的問題，如求計劃差額的方法，求對比產品的方法等。

所有的經濟學家、統計學家和計算工作人員，都必須在理論上

研究社會主義生產費用的計算問題，研究各經濟部門的核算工作的統計形式問題。

×

×

×

斯大林同志對於研究統計學一切最主要的問題，給予了莫大的影響。他的思想和言論豐富了統計學。斯大林同志建立了統計形式的國民經濟計算理論的基礎，奠定了『修正』平均數理論的基礎，並且創造出一整套分析經濟過程動態的指標，以此充實了統計學。斯大林同志對我們垂示了細心閱讀和分析各種統計表（標誌結構動態的）的輝煌範例，提出了編製國民經濟平衡表綱要的任務，並指出了必須以統計形式進行社會主義生產費的核算工作。

（陸秉鈞、侯榮國編譯自『經濟問題』，一九四〇年，第一號）。

# 論統計分組法

戈拉切夫

我們正爲提前實現恢復與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而進行着全民的鬥爭。在這種條件下，經常檢查國家計劃的執行情況，以及與此相聯的，分析國民經濟各部門企業的活動，便更加重要起來。因而，統計工作的意義，也隨着日益重大起來。因爲『任何建設工作，任何國家工作，任何計劃工作，假若沒有正確的計算是不可想像的。而計算假若沒有統計也是不可想像的，計算離開統計，就將寸步難行』（斯大林語）。

統計不能僅僅止於某些事實的單純標明，特別是不能僅僅止於確定國家計劃的某種完成程度。

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根據莫洛托夫同志的『關於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第三次五年計劃』的報告而通過的決議中寫道：

『由於國民經濟一切部門都有了巨大的高漲，因而要求我們進一步改善國民經濟的一切計劃化工作與計算的組織工作。改善計劃工作的中心任務，就是按下述目標去組織計劃執行情況的檢查工作，如：防止經濟中發生不平衡現象，發掘有助於完成計劃的新後備力量，並且根據計劃的實際執行情況在個別部門和地區修改計劃』（註1）。

發掘能幫助完成計劃的新後備力量，揭露出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先進部分和落後部分，乃是蘇維埃統計的重要任務。爲了完成這個任務，我們應該運用統計的一切研究方法。

---

註1：『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記錄』，第665頁。



蘇維埃統計學在自己的武庫中擁有許多有科學根據並經過實際考驗過的研究方法。但是，當我們分析統計資料時，還遠未能很好地應用這些方法。特別是統計分組法的利用情況還很差。

但是，統計分組法却是統計中的根本的東西，同時又是廣大實際工作人員最易於瞭解的東西。有科學根據的分組法，與其他統計方法以及與個別對象的專門研究結合起來，這就能大大幫助解決經濟分析問題。

爲了究明分組法對於經濟分析的一切意義，現在，我們看一看列寧的極其豐富的遺產吧。列寧是馬克思主義統計學的奠基者。我們在列寧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如何研究和應用統計方法、特別是統計分組法的各種經典式範例。

列寧對於在經濟分析中正確應用分組法問題，賦與了最重要的意義，並着重指出過：這個問題並不是狹隘的專門問題。

列寧在一九〇〇年發表了一篇題爲『非批評的批評』的論文。在這篇論文裡，列寧提到地方自治機關統計（譯註）的基本問題和任務時，指出過：『但是，以我來看，地方自治機關統計的基本問題（正如在斯克涅爾佐夫引用我的那段文章中我所指出的一樣，關於農戶材料分組方法的問題，就是基本問題），不僅地方自治機關

---

譯註：地方自治機關統計：地方自治機關是帝俄時代的地方自治組織。創立於一八六四年。它的職能是：掌理村的財產保險，慈善，醫療，文教，郵政，道路，統計等事宜。地方自治機關沒有執行權，完全服從地方專制機關的命令行事，所以實際上，它不是自治組織。地方自治機關統計就是地方自治機關當時所進行的統計工作。地方自治機關統計除了收集政府用的資料（徵收土地稅等）外，還曾研究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俄國的社會經濟關係，地方自治機關統計蒐集了豐富的有關俄國農村中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資料（農民公社的解體，僱農，土地租賃，農具，土地，牲畜等在農民階層間的分配狀況）。地方自治機關統計的資料曾被列寧利用研究農村的分化過程。列寧曾指出這些資料中有許多地方對於資本主義的剝削現象的記述有着嚴重錯誤或缺陷。

統計工作者有權利、甚而有義務去談它，而且一切經濟學家們都有權利、甚而有義務去談它』（註2）。

我們根據列寧的內容極其深刻的各種指示，可以歸納出統計分組方法論的各種基本原理來。

如何正確應用統計分組法的第一個必要條件，就是根據經濟理論去確定被研究的現象的本質。這就是說，研究方式應該『適合於過程的形態上的差別』（列寧語）。

列寧在批判民粹派經濟學家們時（他們一般都把『工廠』工業與資本主義看成是一個東西，而且在工廠統計問題上表現得『驚人的無知』），歸結到這一點上：『……他們很可笑地把大機器工業發展的問題還原成某一個工廠統計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並不單單是一個統計問題，而是該國工業中資本主義發展所經過的形式和階段的問題。只有我們究明了這些形式的本質和它們的特點之後，然後再以經過適當加工的統計資料去表示某種形式的發展，才是有意義的』（註3）。

把統計分組所要研究的課題正確規定出來，是科學地應用統計分組的重要條件。只有預先指出分組的研究目的，分組才有科學方法的意義可言；如果不這樣，它就會變成『統計表演』，製成『數字遊戲』。

分組可能有下列各種基本任務：

第一、根據經濟理論去究明現象的社會經濟類型、經濟單位的類型、企業的類型等等，並找出它們的統計表現形式。列寧指出過：『經濟統計必須以經濟單位的規模和類型的分組為基礎』（註4）。列寧曾規定了分組法的基本任務。他說：『一切問題，任務的一切

---

註2：『列寧全集』，第3卷，第4版，556頁。

註3：『列寧全集』，第3卷，398頁。

註4：『列寧全集』，第3卷，554頁。

困難，就在於：如何彙總這些資料（每一經濟單位的——戈拉切夫註），使之能正確反映出經濟單位的各種組和類全體的社會經濟特徵』（註5）。

第二、根據經濟理論去發現能影響社會經濟類型變化性質的因素，確定這些因素的影響程度和相互依存關係。

第三個任務是與前兩個任務緊緊聯繫着的。第三個任務就是研究各個典型組中分組標識的數量上的變動，並藉以用統計的方法表示各組間質量上的差別。

第三個任務的具體表現和實現，表現在編製組別表和混合表上。列寧在其『關於地方自治機關統計任務問題』一文中，批評地方自治機關統計時，寫道：『現象的經濟類型，即只有從各方面合理編製出來的組別表和混合表中才能表現出來的類型，是在數字的內部隱藏着的』（註6）。列寧認為當研究『一切在實際中已表露出或表露着（這也是同等重要的）的經濟類型』（註7）時，這些表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

其次，在列寧關於分組的指示中，特別強調過從經濟方面正確解決分組標識問題的特殊重要性。正如列寧在其『關於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發展法則的新資料』一文中指出過的一樣，『同是一樣的材料，如果應用各種不同的分組方法，就會得出各種恰恰相反的結論來』（註8）。

與正確選定分組標識這一問題聯繫着的，還有組距的選定。在決定組距時，應該使它們分清根據經濟理論規定出來的社會經濟類型。如果不這樣，一切分組都會失掉它們的意義。

列寧在批判把農業材料分割成二十五組的德國統計分組時，寫

---

註5：『列寧文集』，第19集，363頁。

註6：『列寧全集』，第20卷，68頁。

註7：『列寧全集』，20卷，67，—68頁。

註8：『列寧全集』，第22卷，55頁。



道：『把五百七十三萬六千零八十二個農戶按土地分成這樣一些組（即二十五個組——譯註）的統計，是官僚主義作風的典型，是愚昧無知的典型，是毫無意義的數字遊戲，因為在這些組裡，任何理智的、合理的、能被科學和實際所確認的東西也沒有，並沒有任何根據可以把這些組認作是典型的』（註9）。

莫洛托夫同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批評了把農戶分成五個組的不正確的分法，在這種情形下，『農業中的主要形像就會變成農村中五個組中的一個勉勉強強才能看得出的組』。

莫洛托夫同志批評中央統計局一九二七年時期引用在『土地改革平衡表』中的資料時指出過：這些資料『不但根本與實際不相符合，而且還是中央統計局的一個很有害的經濟錯誤和政治錯誤』。接着莫洛托夫同志說明了平衡表編製者在政治上有害的、反科學的思想的實質就在於：『在兩種情形下（革命前和革命後），一切農民都被計算在一個組內（這是多麼奇怪！），而且在中央統計局的表上根本也沒有富農、中農、貧農，根本也沒有任何階級，也就是說：沒有任何科學的分組』（註10）。從這裡，莫洛托夫同志便得出了結論說：『中央統計局當時並未完成統計學的最基本的要求』（註11）。

當我們談論分組方法論時，應該注意到第二次分組的方法。這種方法，列寧已在其經典著作『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中應用過了。為什麼在加工地方自治機關統計資料時必須應用這種方法呢？這是因為：地方自治機關統計員對各種不同地區的農戶進行統計時，藉以分組的那些標識的性質是多種多樣的。如果沒有全區的原始資料時，分組標識上的這些差別就會使綜合統計資料時發生困難。列寧使用了標誌農戶社會經濟組別之間的關係的資料，而在全區

註9：『列寧全集』，第22卷，71—72頁。

註10：『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記錄』，第1050頁。

註11：『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記錄』，第1051頁。

內對每一組的農戶數都使用了同一的百分比，以保持高級（富裕的）組、中級組、低級（破產的）組之間的對比關係。這時，列寧把地方自治機關統計資料，正如在農戶數目方面一樣，又在播種面積和牲畜數目方面加以更細的分組。每個社會經濟組在全縣播種面積方面和牲畜方面的比重，就是這樣計算出來的。

列寧所應用過的這種方法，豐富了統計學。這種方法是真正科學的東西，因為『……這樣細分組，我們一點也不改變農民的高級階層和低階級層之間的實際關係……只有用這種方法才能把在各種不同地位上具有各種不同條件的農民的分化資料加以比較』（註12）。

第二次分組在某些情形下，也能應用於蘇維埃統計資料上。經濟分析可能要求那些已按各種分組標識分了組的表上的各種指標，必須相互適應；但這裡所說的表，是指着已經公佈過的表而言，所以進行換算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或者是沒有意義的。經濟理論指示着：應如何使各種指標這樣互相適應，而在第二次分組的幫助下，這種互相適應就可以得到統計表現。

發展分組法的榮譽，毫無疑義，是屬於俄國統計學家的。遠在十九世紀中葉，著名的俄國統計學家朱拉甫斯基（1810—1856）便確定了統計學是一種『範疇計算』的科學，並規定了：統計的基礎就是範疇——組的計算。一八八二年，地方自治機關統計學家石利克維契提出了混合表，給統計分組以適當的表現形式。

但是，只有在列寧的不朽著作中，統計分組的應用才獲得了真正科學方法的意義；這一點就揭開了統計史中的新的一章，成了我國在為建設共產主義社會面鬥爭中的有力而有效的武器了。

×                      ×                      ×

組平均數的問題是與統計分組的應用緊密聯繫着的。

列寧在其著作中，曾把統計分組法與平均數法廣泛聯結起來，在經濟研究過程中把它們統一起來。列寧經常利用能標誌各個社會

---

註12：『列寧全集』第三卷，第100—101頁

經濟類型的平均數，而且避免利用一包在內的平均數。一包在內的平均數並不表示，反而模糊各個類型之間的質量上的差別，而且並不反映被研究的現象的已表露出或正在表露着的質量變化和動態。這樣的平均數是形式的，是虛構的。

列寧在其著作『彼爾木省一八九四——一九五年家庭手工業調查與「手工」工業的一般問題』中，在考察和分析某些行業的統計資料時，曾把大作坊分離出來，因為『把大作坊和小作坊混合在一起，得出來的就會是完全虛構的「平均」數，這種數字並不能使我們對實際有任何理解，是模糊主要的差別，以同類來反映某些類別完全不同的、各種構成的東西的』（註13）。

但是，組平均數却與一包在內的平均數恰恰相反。組平均數僅僅是在每一個質量上屬於同類的組的範圍內計算出來的。

列寧當分析農民階級分化過程和研究其他社會經濟問題時所利用的，正是標誌着各個社會經濟類型的組平均數。

斯大林同志對於組平均數問題，曾有過最重要的指示。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九年四月聯共（布）中央全會上的演說（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中，提到了列寧的著作『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並說到『列寧怎樣責罵了那些在估計播種面積增長情形時採用平均計算法，而忽視按區統計材料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

（註14）。斯大林同志指出：當研究播種面積問題時，不要運用全國平均數：『按區考察播種面積變動情形，即是按科學方法來考察問題，就可以知道：某些區域裡的播種面積是一貫增加着，其他區域裡的播種面積，主要由於氣候條件不良的關係，間或減少了一些……』（註15）。斯大林同志指出了，『平均數法若不用按區統

---

註13：『列寧全集』，第2卷，382頁。

註14：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11版，中譯本，353頁。

註15：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中譯本，353頁。



計材料來修正，便不可算作科學的方法』（註16）。

斯大林同志這一指示的意義，遠遠超出了播種面積問題的範圍。這一指示是具有一般科學意義的。在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認識中的平均數法，就是組別的、訂正過的平均數法。

我們對於斯大林同志關於訂正過的平均數的指示，不可狹隘地去理解——不可把它只看成在地區方面計算訂正平均數時才是必要的。組的平均數應該在一切經濟統計研究中加以應用。例如，當研究工業時，平均數不應僅僅按各個地區來計算，而且還要按部門、按企業組計算，把先進企業組分出來。

很明顯，在一定的情形下，也要應用總平均數，但是，整個問題就在於：總平均數不應該是一包在內的。如果代替一系列的組平均數，把各種組平均數替換出去而使它一包在內起來，把各個質量不同的組之間的差別平等化起來，這時，總平均數就會成爲一包在內的。但是，如果總平均數是與組平均數聯系着而計算出來和分析出來的，這時，總平均數就不會是一包在內的，就不會是虛構的。

組平均數的應用，在計算平均先進定額時，是很重要的（現在，平均先進定額在我國企業製訂生產資材利用計劃時，是必要作爲基準的）。

發現個人優秀工作的範例，對於進行分別的分析工作也有很大意義。

× × ×

蘇維埃統計的基本任務就是：在馬列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上，研究在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期中，蘇聯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的規律，以及分析現代資本主義的矛盾。但是，資產階級統計的任務，則是替資本主義辯護，模糊資本主義制度所具有的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粉飾資本主義腐朽過程和衰亡過程。

蘇維埃統計是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工具。蘇維埃統計正運用着分組法，去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和文化。分組法正在幫助發現各

註16：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中譯本，353頁。

個部門中的成就，並把它們的經驗推廣到其他部門中去；以及提醒某些部門可能發生的缺陷。

爲了保證我國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的成就，要求不斷改進統計研究方法，特別是要求改進統計分組法。

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統計，特別是英美的統計，由於它們的階級狹隘性，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科學的分組法。科學的分組法，對資本主義經濟對象進行分組時，一定要按階級區分。但是，對於這一點，資產階級的統計是無能爲力而且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於是，當資產階級統計利用分組法時，它就給分組法加上一些形式上的數量性和算術性。

資產階級統計分組的特點，就在於：分組標識常常帶有外表性，而且分組的根據就是非本質上的標識。這種分組標識的數目，往往是很少的。例如，美國一九三〇年工業調查總結中，對於加工工業企業，僅按兩種標識分組，即雇傭工人數和生產總量。在同一調查中，並未按某些非常重要的標識進行企業分組，如固定資本額，發動機能力等等。在分組的本身中，各種標識並沒有互相配合，也沒應用混合表。

列寧在其『關於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發展法則的新資料』一文中，談到農業調查資料，特別是談到美國一九一〇年調查時，指出過：『由於綜合和分組不熟練、沒經過深思熟慮、墨守成規』（註17），因而，收集來的資料，都沒能有什麼用處。

資產階級統計，根本談不到什麼分組體系。每個組在質的構成上是非同類的，每個組中都包括了各種不同的社會經濟類型，這就使綜合的一般化的特徵，陷於歪曲。但是，以辯解爲目的的資產階級統計，也正是需要這一點。

前面所說的，還未把資產階級統計藉助於分組而捏造事實的方法全都說出來。

---

註17：『列寧全集』，第22卷，第43頁。

現在我們談一談檢查國家計劃的執行情況時如何應用分組法的問題。

整體地研究計劃工作對象，是正確製訂部門計劃或地區計劃的前提之一。同時，當製訂計劃和檢查計劃執行情況時，又必須對於企業組和個別企業採取分別處理的態度。

在聯共（布）中央一九四七年二月全會關於『提高戰後農業的辦法』決定中指出過：我們必須結束『在評定集體農莊、國營農場、機器拖拉機站和地區的工作成果時，用平均數代替分別處理的不正確的態度。分別處理能夠發現先進的和落後的，並把落後的提高到先進水平上來』。聯共（布）中央全會的這項重要指示，具有一般的原則性意義。

當分析國民經濟計劃中工業計劃的執行情況時，必須把先進企業和落後企業分開，去研究它們的工作，而且還要把規模最大、技術裝備最好的企業分出來研究，把新建企業和完全改造過的企業分出來研究等等。當然，把企業這樣分開，應該是在工業各個部門範圍內進行的。

現在我們研究一下，當處理工業企業總生產量計劃執行情況的資料時，可能有什麼樣的分組形式。

總生產量計劃執行程度的計算，應該幫助解決一系列經濟任務，並且不僅應成為爭取完成計劃的有效工具，而且還應該成為準備製訂新計劃的有效工具。因為應當完成的任務具有多樣性和複雜性，於是要求應用綿密的經過深思熟慮的分組體系。這種按某些標識而建立的相互聯系並相互輔助的分組體系，能夠使我們發現生產組織的缺點和脆弱環節，以及發現先進企業的有益工作經驗。當然，在經濟分析上應用一切分組時，都不應當是孤立的，而應當是與其他各種統計方法緊密聯系着的。

當按總生產量計劃完成程度而進行工業企業分組時，應該指出完成、超過完成或未完成總生產量計劃的各種企業，應該指出每一



個這樣企業組所具有的意義，應該指出未被利用的生產後備力量，超過完成計劃的基本因素，未完成計劃的原因。

爲了使分組更具體一些，分組可以按部別——個別的，按聯盟和加盟共和國所屬的企業進行，而在各省則按省轄和區轄企業進行。

爲使各該表更具有實用性，在編製各該表時，不僅應該編製年度表，而且也應該編製季度表，甚而應該編製月度表。很明顯，表中包括的指標數，將決定於各該定期報表的內容。

現在，我們談一談假定的組別表的主項和賓項的內容。

在主項中可能按着以固定價格或其他價格表現的總生產量計劃完成程度（百分比）把企業劃分成各種組，如80.0以下；80—89.9；90—94.9；95—99.9；100—104.9；105—109.9；110—119.9；120—129.9；130—149.9；150及150以上。

把各企業分成這些組，是分組的第一階段。我們根據企業分組的實際情形，如有必要時，擴大組距，藉以減少組數，也完全是可以的。但是，無論在任何情形下，都要適當地保持兩個極端的組，即一方面是先進企業組（它的經驗要特別加以研究），另一方面是非常落後的企業組（需要改善它們的業務的）。

在這一點上，還需要再着重指出一下，即還必須對個別企業進行專門研究，補足統計分組，首先就是要專門研究先進企業，因爲推廣它們的經驗，是具有國民經濟意義的。

同時，還可以把各組，即按某些標識規定的相互聯繫的各組，正確地分成兩個擴大的企業組：（一）完成了和超過完成了計劃的企業組，（二）未能完成計劃的企業組。

從未能完成計劃的企業組中，可把一貫不能完成計劃的企業適當地分出來。例如，可以把季度中有二個月到三個月沒能完成計劃的企業、在半年中有四個月到五個月沒能完成計劃的企業列入這組之內。當然，根據研究工作的具體條件，也可以採取另一些標準，

去確定一貫不能完成計劃的企業。

在生產同類產品的個別工業部門裡，例如在採油業、煤炭業、鑛業等部門裡，也可以按產品實物量計劃完成程度，把各企業分成各種組。

在表的賓項中舉例來說，可以假定有下述各種標誌每個企業組的指標。

（一）企業數目（絕對數和對總計的百分比）；

（二）按固定價格或現行價格（計劃價格和實際價格）表現的總生產量；

（三）平均在冊工人數（計劃數和實際數）

（四）勞動生產率的平均水平（按每一在冊工人總生產量的平均工作量、按計劃與實績計算）；

（五）主要生產設備利用程度的平均百分比。

按着這些項目編製出來的很詳細或較詳細的表，就能使我們按總生產量計劃完成程度把企業分成各種組，用它們的最重要的工作指標來標明這些組的特徵，發掘出各個企業組為什麼能超過完成計劃或沒能完成計劃的基本因素。

例如，我們把各個企業組以及擴大的企業組按每組中所包括的企業數和按它們實際生產的總生產量，來比較它們的比重時，就能夠看出：那樣組佔主要地位。其次，按沒能完成計劃的各個企業組或擴大的企業組，能夠確定出：它們應為國民經濟生產的總生產量，究竟不足額是多少。為了確定這種不足額，應從計劃總生產量價值中減去實際生產的產品價值。同時也能夠計算：如果這些企業的工作能夠提高到先進企業的水平時，這些企業將能超過計劃多生產出多少產品來。

至於如何確定那些使計劃超過完成或未能完成的原因和因素，則是一個較複雜的問題。為要確定這些原因和因素，我們可以去詳細研究表中賓項的各種指標。現在，我們談一談：前述賓項中已有

的指標，可能有時不足以解決前面提出來的問題，這時，我們就應該用擴大指標範圍的方法去擴大賓項。

當我們對比某些企業組的生產量計劃完成程度的資料和工人人數的資料時，就能夠看出勞動力使用這一因素的影響。

我們所研究的表的基礎，是按總生產量計劃完成程度而對企業的分組。我們在這裡，要特別強調一下，僅僅這種分組的本身（也就是孤立地被拿出來的）是不夠的，因為在每個組的構成中可能有各種能力的企業。因此，我們就感到應按能標誌企業規模大小的標識把企業分成各種組的必要。列寧在『莫斯科省的勞動日和勞動年』一文（一九一二年）中指出過這種標識的意義。他說：『生產類別方面的區分，對於社會經濟統計來說，較生產規模方面的區分，特徵性小，重要性也小。當然，這並不是說，前一種區分可以忽略過去。但是，這却是說，如果不計算第二種區分，那麼，有意義的統計，是絕對不可能的』（註18）。

列寧的這一指示，對於蘇維埃統計來說，也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

根據前面所說的，就要求我們按兩種相互聯繫的標識（生產量計劃完成程度和企業規模）而進行聯合的分組。但是，這樣的分組將是非常麻煩的，因為每個組和小組不得不再用一些賓項指標加以標明。因此，另外按企業規模大小的標識把各種企業分成各種組是很適當的，而且這種分組將是按生產量計劃完成程度分組的一個必要補充。我們要指出：在兩個擴大的組（完成及超過完成生產量計劃的企業組和未能完成計劃的企業組）的分界條件下，是能比較正確地按企業規模大小的標識進行分組的。

當選擇企業規模標識時，可用下述指標，如工人人數、固定基金的全部原初價值、發動機能力。至於在每一種個別的情形下，究竟應該選擇那一些指標呢？這個問題就要根據我們所研究的工業部

註18：『列寧全集』第18卷，245頁。



門的性質來決定。例如，我們要研究耗費勞動力較大的部門（煤炭業、礦業等），這時，就可以選取工人人數指標，作為企業規模大小的標識。如果我們要研究耗費電量較多的部門，這時，就可以利用供生產過程需用的動力能力作為分組的標識。最後，如果我們要研究所謂『需要投資多』的企業，這時，就應該用固定資金原初價值作為分組的標識。

為了明顯起見，現在我們引用一個按工人人數標識進行企業分組的例子。我們在下面僅限於指出表的主項，因為在賓項中，基本上是和前表的指標一樣的。

按總生產量計劃完成程度的標識而劃分的企業組	按工人人數的標識劃分的企業小組	賓項指標
A、完成了和超過了計劃的企業組	89人以下	
	100—249	
	250—499	
	500—999	
	1000—1499	
	1500—1999	
	2000—2999	
	3000—4999	
	5000人以上	
B、未能完成計劃的企業組	89人以下	
	100—249	
	(以下同)	

當然，在這裡，組數和分組的組距也是一種舉例的說法。當我們按發動機能力和固定資金價值的標識而分組時，無論是組數或組距的數量上的意義都要根據各該工業部門的性質來決定。

我們所引用的分組，可使我們知道：在這兩個擴大的組內，什麼樣的企業佔着主要地位。很明顯，進一步的分析，將在很大程度

上，被具體統計資料所決定。

除了前述分組外，分析生產量計劃的執行情況時，還應該利用下述各種分組，即與總生產量指標相聯繫着的勞動力數、工資基金的支出、工作時間利用、工作量定額完成程度、換班制度等等指標。這樣的分組，都是有很大經濟意義的。

其次，還應該利用另外一些在分析總生產量計劃執行進程時所必要的分組，例如：

(一) 按勞動生產率水平而進行的企業分組（把它與工人平均工資水平及企業工作的其他指標聯繫起來）。

(二) 按工作換班次數而進行的企業分組（把它與產量、設備利用程度、工作的質量聯繫起來，這是爲了把實行各種不同換班制度的企業的工作，對比起來，研究它們的效果）。

我們所敘述的問題，並不是詳盡的。我們僅是想指出在分析計劃執行情況時，廣泛應用分組法，是可能的。

×

×

×

最後，我們談一談當研究個別問題時如何適當地應用分組法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在三次斯大林五年計劃時期中，我們新添了成千的大的、中等的、較小的工業企業；在戰後五年計劃中，已經開動了和正在建設着成千的新企業。

這時又產生了一個任務，即如何研究大、中、小企業的經濟效果。在研究這一問題時，應用分組法是很適當的。

與這個任務緊密聯繫着的，還有另外一個任務，這就是研究新的、改建過的、舊的企業的工作效果。爲此，應該把企業按設立年代和恢復年代去分組（這種工作已由蘇聯中央統計局進行了）。

其次，爲了從整個國民經濟利益的觀點去確定企業規模時，也應該利用分組法。因爲企業規模的問題是和社會主義工業合理分佈問題聯繫着的。在這種情形下，就可以按固定資金的原初（或重

建)價值標識或按服務於生產過程的合計動力能力標識進行企業分組。

這種分組可以指示出：在一定具體條件下某部門企業規模和這些企業生產活動的質量、數量指標水平之間的依存關係，只要我們考慮到這一點，那麼，這種分組的意義，就很明顯了。

分組法也可以應用於生產過程機械化的研究工作上。例如可以應用於煤炭那樣重要而耗費勞動較大的部門的機械化研究工作上。我們可以把礦井作為研究生產機械化時應用分組法的例子。如按年採煤量（把它與主要採煤過程——鑽孔、掘煤、裝車、卸煤——機械化程度聯繫起來）把礦井分成各種組。這種分組應該按各煤礦區進行；個別的，要按各種傾斜度和其他形式的礦井進行。

直到這裡，我們所談的，都是工業企業的統計分組。但是，分組也可能而且也應該應用於工業方面的其他研究對象上。如勞動力、機床、車間等等。另一方面，把分組法應用於其他國民經濟部門中的對象上，也能够得到有效的成果。

統計分組法是經濟分析的基本方法之一。它應該廣泛應用於統計實踐中。而且在統計教科書中以及在科學研究著作中，也應給予應有的地位。

（陳東旭譯自蘇聯『統計通報』一九四九年第一號）